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少年哲学向导丛书

漫步在巨人的智慧王国

——毛泽东哲学略览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漫步在巨人的智慧王国

引 言

朋友，你知道吗？美国有位天文学家，名叫麦克·哈特。1978年，他出版了一本书，名为《人类百位名人排座次》。该书一问世，便旋即传遍世界各地，成为全球性畅销书。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生活过的数百亿人当中，究竟谁在历史的进程中影响最大？哈特博士根据自己的标准——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从百科全书上列举的2万人中选出100人，并且按影响大小排列了名次。毛泽东是入选人之一，并被排在第20位。且不说作者的标准是否科学，也不说名次排列是否合理，把毛泽东列为世界名人，却是合乎事实的。

是的，毛泽东的确是位世界级名人、伟人和巨人。这不是个别人的看法，而是世人的共识。

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是毛泽东要好的外国朋友。1936年，他以外国记者的身份，曾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彻夜长谈，最后写成了影响极大的《西行漫记》一书。他是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毛泽东是活动家、原动力、创造者，是交替运用突然袭击、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成就的策略大师。

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研究毛泽东的著名学者弗兰西斯·苏认为：“不管人们对毛泽东的个人看法如何，但没有一个人可以否认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人物，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以至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都是不言而喻的。”

国内一位著名的学者也明确地指出：不管你是爱是恨，是赞扬还是批评，毛泽东比任何其他人物在中国现代留下了远为庞大的身影。这身影覆盖了、主宰了、支配了数亿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命运和悲欢。他将是长久被反覆研究的对象。

就连一贯与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唱对台戏的王明，也曾经高呼“学习毛泽东”。1940年5月初，王明在延安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讲演。他以富有逻辑性的理论家的特长，概括了学习毛泽东5个方面的精神。这就是：始终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勤于学习的精神；勇于创造的精神；长于工作的精神；善于团结的精神。虽说王明的说法言不由衷，但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毛泽东的不同凡响。

对毛泽东最具权威性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是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他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个评价，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是被历史业已证明了的科学结论，也是毛泽东之为世界巨人的最有力的佐证。

巨人之为巨人，自有巨人的智慧。哲学是智慧之学。巨人的智慧，集中体现在巨人的哲学中。毛泽东的智慧之光，集中闪烁在毛泽东的哲学思想里。

毛泽东哲学，即是毛泽东之为巨人的一方面表现，又是促使毛泽东登上巨人宝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了解这一哲学，即可以使我们从哲学的层

面上，认识毛泽东是怎样的巨人，又可以使我们从哲学的角度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巨人。

毛泽东哲学，是毛泽东留给后人的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恒久的文化遗产。掌握这一哲学，虽不能保证它的每一位拥有者都成为巨人，但却有利于人们的生活顺利、事业成功。

少年朋友，“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即有“指点江山”的宏图大志，又有成为“风流人物”的博大胸怀。此时此刻，学学毛泽东哲学，无疑更有助于理想目标的顺利实现。

愿少年朋友都成为毛泽东哲学的拥有者。

愿本书成为少年朋友步入毛泽东哲学殿堂的铺路之砖。

一、时代·伟人·哲学

——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发展及其他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马克思

1. 时代的要求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是适应一定时代斗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毛泽东哲学也不例外。

毛泽东哲学产生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它的产生，既与当时的国际条件分不开，也与当时的国内条件相关联。

从国际条件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即由理论准备阶段进入了直接实践的时期。

1917年爆发的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在帝国主义阵线最薄弱的环节上，一举推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十月革命的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阵线，开创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新纪元；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后方，震撼了帝国主义在殖民地、附属国的统治，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新纪元，促使民族民主革命新高潮的到来。

从国内条件看。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祖先创造的灿烂的经济和文化成果，曾经长期在世界上居于统治地位。但在近代，在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却一步步落在先进国家后面。从1840年鸦片战争起，帝国主义不断入侵我国，逐步地将封建的独立的中国社会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勾结，变中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也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开始，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进行了长达70多年的艰苦斗争。但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这些革命都失败了。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推动下，1919年爆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自觉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使中国的民主革命发展到一个新的转折点——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迫切要求有自己的革命理论的指导。毛泽东哲学，就是适应这种革命的需要并在这种斗争实践中产生的。

2. 理论的渊源

马克思的好友恩格斯也说过一段极为精辟的话：“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也就是说，任何哲学的产生，是以前人已取得的思想成果作基础的。后人要创立

新的哲学，往往要踏在“前人的肩上”。毛泽东哲学也是这样。

毛泽东自己曾经说过，由于中国社会进化的落后，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也就是说，毛泽东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当时，只是一些先进的人们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中，了解到马克思的名字以及马克思主义的零碎片断，而且只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得到真正传播。特别是五四运动后，在中国社会掀起了一个波澜壮阔的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运动。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李达、蔡和森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毛泽东哲学虽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来的，但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分不开。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文化传统和哲学传统，有着无与伦比的丰富思想和文化遗产。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含有不少消极、落后、非科学的东西，但也有许多闪烁着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光辉的思想成果。这些成果，为毛泽东哲学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毛泽东哲学就是在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某些范畴和观念，如：“实事求是”等等；二是科学地总结中国传统哲学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重大理论问题，如“知”、“行”关系问题等等；三是批判继承中国传统哲学中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华，如“相反相成”、“一物两体”等等。

由于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这就一方面使这些古老的东西大发异彩，把中国传统哲学推向新的发展高峰；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使之具有中国气派和中国作风，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可以肯定地说，不批判继承中国哲学的优秀成果，不把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融合起来，就不可能产生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哲学是中西方文化碰撞、交融的产物。

3. 伟人的特质

毛泽东，字润之，1893年12月26日出生于湖南湘潭韶山冲上屋场一个农民的家里。由于特殊环境的影响和时代的造就，由于家人的培养、师长的教诲和朋友的砥砺，特别是由于毛泽东个人的积极奋斗、不懈努力和严格律己，使他具有了种种优良的精神特质。这些精神特质，是毛泽东哲学产生和发展的主观条件。

（1）伟大的理想和抱负

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古往今来，凡是成就大事业者，都是具有远大理想和伟大抱负的人。毛泽东自然也不例外。

还在 13 岁那年，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及另一个亲戚家的孩子给祖父拜年。堂叔问道：“你们三个读书的伢子，长大后都想做什么？”亲戚家的儿子首先答道：“我要做有钱的人。”毛泽民想了想说：“我要做不受欺负的人。”最后，轮到毛泽东，只见他不慌不忙地说：“我做掀天揭地的人。”小小的年纪竟有如此的胸怀！在座的人听了，无不感到钦佩和惊讶。

是的，毛泽东从小就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读初小时，就决心以救国救民为自己的崇高责任，为此，还给自己起了一个“子任”的笔名。后来，离家赴长沙求学，临行时，他曾抄了一首诗送给表兄，表达了他远大的志向，诗中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当他读了《盛世危言》和有关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时，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产生了忧国忧民和立志救国救民的思想。五四运动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更坚定了他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决心，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正是在这远大的理想和抱负的鼓舞和鞭策下，毛泽东才不管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科学的世界观

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对于人的思想认识的正确性和深刻性，对于调节人的行为方式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任何人的世界观，都不是生来就有的，往往要经历一个形成和转变的过程。毛泽东的世界观，在早期，也是不科学的，但是，经过他的努力，到 1920 年底 1921 年初，已经确立了科学的世界观。

1949 年 5 月 7 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毛主席常说，他是从农村中生长出来的孩子，开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后的。他最不同意晋察冀一个课本描写他在 10 岁的时候就反对迷信，说他从小就不信神。他说恰恰相反，他在小时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得很厉害。当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去求神拜佛。”是的，毛泽东早年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并且带有迷信的色彩。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敢于承认自己最初的世界观是复杂的、不科学的，而且在于，他能够从迷信中觉悟过来，抛弃唯心主义世界观，尽快完成世界观由不科学到科学的转变。

具体地说，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过程，经历了相互衔接而又各具特点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13 年至 1918 年 6 月，他的世界观从客观唯心主义的“无我论”到主观唯心主义的“唯我论”，并以二元论为契机，开始向唯物主义转化；而其基本哲学倾向，则是以“唯我论”形式表现出来的主观唯心主义；在伦理观上表现为个人主义；在历史观上强调个人的价值。同时，还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其中，变化观念、抵抗和差别观念，尤为突出。

第二阶段，1918 年至 1919 年，即五四运动前后，开始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其标志是：唯物主义思想原则基本确立，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理论联系实际的基本思想已经形成，强调讨论各种理论，应联系

活事件；唯物历史观开始萌芽，不仅注意从经济因素考察人的社会地位的差异，而且高度评价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

第三阶段，1919年至1921年初，世界观转变完成，科学世界观确立。毛泽东后来回忆这一阶段的情况时曾说：“到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第39页）毛泽东完成世界观转变的标志是：进一步发展了唯物主义思想原则，更加自觉地把从实际出发当做改造中国的指导方针；强调实践在社会改造中的意义，认识到实际的行动比理论更为重要；在历史观上，确立了阶级斗争观点，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

青年毛泽东世界观转变的完成，即科学世界观的确立，为毛泽东哲学的产生，奠定了必要的世界观基础。

（3）独特的为学之道

毛泽东具有强烈的求知欲。读书奋斗，终生不辍，是他鲜明的个性。毛泽东读书不是不讲究方法的乱读、瞎读，而是有其独特的读书之道的。

不动笔墨不看书，是毛泽东读书艺术的一大特点。例如，早年他读《伦理学原理》一书，在这本仅有10万多字的书面上，留下了他1.2万多字的批注。正是由于这一特点，毛泽东才为我们留下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等等的珍贵遗产。

博览群书，精读益书，是毛泽东读书的又一个特点。有人研究，毛泽东博览群书，仅主要涉及到的就有10大领域。可以说，毛泽东是一位博览群书的巨匠。在这些领域中，毛泽东偏爱的又是马列著作、哲学、中国历史等。在马列著作中，他读得最多、下功夫最大的，是列宁的著作。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读了40遍。

自学与切磋相结合，是毛泽东读书的第三个特点。毛泽东认为，“学问”两个字连起来组成一个词是很有道理的。既要好学，注重自己看书，独立思考，又要好问，与他人讨论、交流。讨论、交流的目的，是使大家都取得真知、真理，即所谓“殊趋而同至”。因此，他在利用一切时间独立自学的同时，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向他人求教、质疑问难，并努力创造一些共学的条件，如创立哲学学习小组、俄罗斯研究会、星期同乐会、新民学会等等。

毛泽东读书的第四个特点，是既读有字之书，也读无字之书。读无字之书，就是向社会学习，向实际学习，向群众学习。为了读无字之书，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多次利用假期，积极开展游学活动。参加革命后，就更加自觉地面向社会，深入实际，注重实践。由于长期读无字之书，使毛泽东逐步养成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这和那些只读有字之书、专门从书本上讨生活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优化的知识结构

毛泽东独特的为学之道，使他建立了独特的知识结构。总的说来，毛泽东的知识结构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广博性与精深性的统一。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一方面具有丰富

的、多学科的知识。如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学、历史、逻辑学、美学、宗教学、地理、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知识，都无所不有。从古代的到现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从社会的到自然的，可以说，都有所涉猎。由此看来，说毛泽东是通晓古今、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并不为过。另一方面，某些方面的知识，如历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等，都有精深的造诣。就历史而言，有人说，对于中国历史，像毛泽东那样熟悉的，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内，就是在近代革命家中，都是不多见的。哲学方面的知识也是如此。总之，在毛泽东知识结构中，广博性与精深性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二是具有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毛泽东是在经过对各种思想流派和革命学说进行探讨、比较之后，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而他一旦认定马克思主义是唯一能够救中国的真理，便自觉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千方百计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是其知识结构中基本的也是重要的内容。

应当特别地指出，从数量上说，毛泽东所读的马列著作，并不比他同时代的人，如陈独秀、王明等人多，但是，由于他重视读无字之书，具有丰富的实际知识和实践经验，又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联系，所以，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和掌握，要比其他人快捷得多，深刻得多，牢固得多，更善于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是说，在质上，他对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把握，比其他人要优越得多。

三是实际知识占有相当的比重。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中，充满着大量的理论知识，这是没有人能否认的，也是同时代人很少能与之比拟的，更使同时代人感到望尘莫及的，是他还具有极为丰富的实际知识。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关于中国国情的知识，也就是关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现实状况、自然环境、人口数量和密度、科技文化水平、生产力状况、社会制度诸方面的因素，以及这些因素间的相互关系的知识。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与他喜欢读无字之书、重视国情的了解和研究分不开。二是关于中国革命实践的知识，包括革命的成功经验的失败的教训。获得这方面的知识，与他长期投身革命实践、饱尝“甜酸苦辣”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相对于中国革命的需要和毛泽东哲学的产生来说，是合理的、优化的。其广博性，使他开阔了视野，站得高，看得远，促其深刻理解、系统把握马克思主义。其对于历史、哲学、军事等知识的精深性，不仅能帮助他解决实践中的具体问题，而且有利于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形象化。其高质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使他能有效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并在实践中正确地坚持它，发展它。其书本知识和实际知识并重，一方面，由于有书本知识，可以使实际知识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从而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另一方面，由于有实际知识，可以使书本知识向实际方面发展，不停止在书本上，从而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应当说，毛泽东哲学的产生，是得益于他优化的知识结构的。

当然，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的合理性、优化是相对的。事实上，其中也有某些不足或缺。比如：外国文学的作品，除少数名著外，他读得很少；中国的现实文学作品也读得不多；至于经济管理方面的书，特别是国外有关社会化大生产管理方面的书读得更少。他自己曾说过，他注意较多的是制度方

面的问题，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至于生产力方面，他的知识很少。对于经济问题，他是懵懵懂懂，不甚了了。这种状况，不能不使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毛泽东哲学以及毛泽东整个思想的后来发展出现曲折，不能说与此无关。但是，相对于毛泽东哲学的产生来说，这种缺欠和不足，应当说是无关宏旨的。

（5）杰出的创造精神

毛泽东学识渊博、经验丰富，但他不是一个人云亦云、墨守成规的人，也不是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人，而是一个洋溢着创造精神的人。

一个人是否具有创造精神，最重要的就是看他是否敢于怀疑，不惧权威，善于思考，勇于批判。毛泽东在学生时期，就表现出独立思考、反对迷信、绝不盲从的良好习惯和品质。他常对同学们讲：我们读书、看报、上课、听演讲，都要动脑筋想一想，多问几个“为什么”。不论古人的话、洋人的话、老师的话、名流学者的话，都必须反复思考，真是对的，才能接受。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比如：在读《韩昌黎文集》时，凡是他认为道理对的、文字好的地方，就圈圈点点，写上“此论颇精”、“此话甚合吾意”等批语；相反，他认为道理讲得不对、文字不好的地方，就打叉画杠，写上“不通”、“此说非是”等眉批。他并不因为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一位古文大家和古文运动中的倡导者，就不问青红皂白，盲目崇拜。一概接受。

毛泽东在完成世界观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创造精神得以进一步发扬光大。这在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他要求人们一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是又强烈反对那种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对于那种把马克思偶像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教条主义，他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主张，真正的理论家，应是富有创造精神的人，善于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就毛泽东自身而言，他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但又不受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的束缚，勇于发展马克思主义。他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下，善于提出新的科学理论和观点。他自己是一个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要求人们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毛泽东创造精神的集中体现。

1945年5月，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指出：“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新，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刘少奇选集》）上卷，第336-337页），这是合乎客观事实的正确结论，也是对毛泽东哲学产生的主观条件很好的说明。

4. 发展的轨迹

事物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毛泽东哲学，也有一个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具体说来，这个过程，可分为如下5个阶段。

（1）萌芽阶段（1921 - 1927）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萌芽阶段。其主要标志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因为，这两部著作，在解决敌友问题和主力军问题时，渗透着从中国实际出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在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时，体现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在热情歌颂农民运动时，贯串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这两部著作，虽然不是专门的哲学著作，但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包含着毛泽东哲学日后进一步发展的那些基本因素。

（2）产生阶段（1927 - 1930）

从1927年9月向井冈山进军，到1930年5月《反对本本主义》的发表，是毛泽东哲学的产生阶段。其标志就是《反对本本主义》。因为：这部著作是毛泽东最早的一篇哲学著作，它虽然没有涉及毛泽东哲学的全部内容，但却论述了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东西。具体地说，一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即“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和“保守路线”。前者是实事求是的路线，后者是主观主义的路线。二是强调从实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三是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反对本本主义，指出：我们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但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必须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四是强调调查研究，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口号，号召人们努力做实际调查，洗刷唯心精神。

（3）体系形成阶段（1931 - 1937）

从1931年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到1937年《实践论》、《矛盾论》的问世，是毛泽东哲学体系形成的阶段。其标志就是“两论”。因为“两论”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第一次系统阐述和全面发挥；“两论”建立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特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系。

（4）光辉发展阶段（1937 - 1956）

从1937年“两论”问世到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是毛泽东哲学的光辉发展阶段。这个阶段，可分为建国前和建国后两个小阶段。

建国前，主要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这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最富有生气、最威武雄壮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哲学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的时期。

建国后，主要指 1949 年到 1956 年，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这是毛泽东哲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光辉发展时期。

（5）曲折发展阶段（1957 - 1976）

从 1957 年开始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到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是毛泽东哲学的曲折发展时期。一方面，毛泽东在新的形势下丰富和发展了认识论和辩证法，写下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重要的哲学著作。另一方面，毛泽东在实践中出现了某些失误，甚至犯了严重的错误，给我们的党和国家造成了重大的损失。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毛泽东哲学进入了发展的新时期。

5. 显著的特点

恩格斯曾经说过：“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465 页）也就是说，每一时代的哲学，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不同于以往哲学的特点。毛泽东哲学，作为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新时代的哲学，自然也不例外。

毛泽东哲学的特点是多方面的。例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通俗化和群众化、侧重认识论、强调主观因素的作用，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在不同方面表现出来的特点。然而，毛泽东哲学的各个特点，并不是不分主次、平等并列的。实际上，既有形式方面的，也有内容方面的；既有本质的，也有非本质的；既有根本的，又有非根本的。因此，我们把握毛泽东哲学，固然要注意其各方面的特点，但更为重要的，是抓住其本质的、根本的或显著的特点。

那么，什么是毛泽东哲学根本的或显著的特点呢？

能够体现毛泽东哲学的整体与全貌、贯串于毛泽东哲学全部内容中，表现毛泽东哲学本质的根本的或显著的特点，不是别的，而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结合。具体地说，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其理由如下：

第一，这是由时代特点决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发生于 20 世纪初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一方面，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哲学作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没有也不可能对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的革命提供现成的公式。要使革命顺利发展并取得胜利，关键在于成功地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结合。由此看来，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成为时代的课题。毛泽东哲学就是在这个“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是对“结合”经验的哲学概括和总结。因此，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结合成为它的根本特点就是必然的了。

第二，从哲学斗争对象的特点看。任何哲学都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哲学自然也不例外。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的哲学活动与马克思、列宁等人不同，在哲学上遇到的斗争对象，不是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而是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也就是主观主

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的哲学研究工作，应当以扫除教条主义思想为主要的目标。”（《毛泽东选集》1991年版，第299页。以下凡引自该书的，均只标明页码）毛泽东哲学正是在同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主观主义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因此，毛泽东在同主观主义的斗争中，不能不对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予以极大的关注，对两者的统一或结合作出全面的说明。这样，就使毛泽东哲学不能不带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或相结合的特征。

第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结合这一特点规定和制约着毛泽东哲学的其他特点。而其他的许多特点，归根到底，不过是这一特点的具体体现。就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个特点来说，它正是由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结合这一显著特点决定的。因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515页）而要使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广大群众所接受、所掌握，就必须使之在形式上和内容上中国化，使之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可见，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特点是由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结合的需要所决定、所制约的。

总之，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或结合是毛泽东哲学的显著特点。只有抓住这个特点，才能从根本上掌握毛泽东哲学。

6. 科学的体系

邓小平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36页〕。其实呢，毛泽东哲学本身也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那么，这个体系是怎样的呢？

毛泽东哲学是一个以实事求是为核心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含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所谓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中引出其固有的规律性，作为行动的向导，以便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有效地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因此，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使主观符合客观，理论一致于实践，一般和个别相结合，并将理论交给群众，变为群众的行动。所以，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主观和客观的关系，认识和实践的关系，一般和个别的关系，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说明上述关系的根本观点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观点、实践第一观点、矛盾观点和群众观点。这四大观点，既是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理论，又是它的基本方法。实事求是毛泽东哲学理论体系的出发点和根本点，这四大基本观点都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并且是实事求是的具体表现和在不同方面的展开。

邓小平在谈到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时曾经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体系。同样地，我们也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要掌握毛泽东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就要掌握它的根本点。而要真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掌握实事求是这个根本点，就要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和把握它的基本内容和基本原理。这是我们学习毛泽东哲学时要特别注意的。

7. 历史的丰碑

俗话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哲学是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而来的，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列宁的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但是，毛泽东哲学，决不是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简单重复和机械照搬，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或者说是中国化了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毛泽东哲学都从哪些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或者说，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主要贡献是什么呢？

仔细观察便会发现，毛泽东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或主要贡献，表现在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历史观等各个方面，并且带有综合性的特征。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哲学的应用上，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从理论上说，其主要贡献在于：

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唯物论原则，既肯定了物质对于意识的根源性、客观规律对于自觉能动性的制约作用，又特别强调了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

以社会实践为基础，全面系统地论证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发展过程、认识的目的、真理的标准等理论，深刻地揭示了人类认识运动的规律和真理发展的规律。

继承了列宁的遗愿，全面展开了矛盾法则的内容，提出了“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的思想。

科学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经验和教训，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创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规律。

深刻地发挥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原理，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切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并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巧妙地结合起来。

从哲学的应用上说，其主要贡献在于：

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成功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创立了军事辩证法体系，既丰富了唯物辩证法的内容，又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光辉范例。

将哲学一般原理化为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策略，提出了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等思想。

将哲学原理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创造了一整套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真正实现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深刻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认识工具的作用。

具体阐述了哲学的本质、功能，特别是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义和本质特征，说明了哲学解放的意义及其实现的途径，为人们科学理解、准确把握、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

综合以上两方面的贡献，可以说，毛泽东哲学是继列宁之后又一次从总体上向前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立起了一座丰碑。

8. 现实的价值

毛泽东哲学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它又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哲学的指导。

回顾中国共产党 70 多年艰苦奋斗的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做了许多事情，总起来说，就是三件大事：第一，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第二，消灭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第三，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件事情，还在做。前两件大事，毫无疑问，是在毛泽东哲学的指导下完成的。以第一件大事为例。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毛泽东哲学的指导下，经过反复探索，总结经验教训，正确认识国情，终于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正如邓小平所说：“在战胜了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失败的王明‘左’倾路线以后，毛泽东同志总结了这次斗争的教训，在 1936 年和 1937 年写下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一系列不朽著作，奠定了我们党的思想理论基础。”〔《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110 页〕第三件大事，现在虽然尚未完成，但从已取得的成就来看，也与毛泽东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情况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 30 多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从而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第二次伟大的飞跃。这次飞跃，正是伴随着毛泽东哲学的恢复和坚持，特别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全党的重新确立而实现的。总之，毛泽东哲学的实际意义，在历史上，是不能否认的；在现实中，是不能低估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和中央负责同志多次强调要认真学习 and 运用毛泽东哲学。例如，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仅阐述了毛泽东哲学的基本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而且要求人们“认真学习 and 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陈云同志曾建议，要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他还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说，抗战时期他从莫斯科回来，毛泽东给他讲过三次要学哲学，特别强调实事求是。陈云同志觉得受益匪浅。邓小平完全同意陈云的意见，他说，“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联合政府》等著作，选编一下”〔《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 267—268 页〕，让大家学习。《决议》和中央负责同志的这些意见，既是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毛泽东哲学现实价值的充分肯定。

在现实生活中，曾经有人以毛泽东晚年犯错误来否定他的哲学的科学价值。应当承认，毛泽东晚年确实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和国家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决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哲学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这一错误的发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他违背了自己长期倡导的某些哲学原理，如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等。这说明：毛泽东哲学的基本原理是不能违背的，违背了就要犯错误。即使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不

例外。重要的问题在于认真研究怎样才能正确发挥毛泽东哲学在现实中的指导作用，而不是否定它的现实价值。

邓小平曾经说过：“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158—159页〕，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毛泽东哲学——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更丢不得。我们应认真地学习它，正确地坚持它，不断地发展它。

朋友，别忘了，这是我们的责任。

二、不朽的“灵魂”——实事求是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

——毛泽东

1. 从哪里出发

平常，我们办事情，就像走路一样，总有个出发点。那么，应当从哪里出发呢？对此，人们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主张从本本出发，认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书上写的，句句都是真理，只要照抄、照搬、照转就行了——这是教条主义的态度；有的人坚持从经验出发，认为经验是来之不易的，它曾使事情取得成功，也将永远导致成功，只要照着经验（或者是自身的经验或者是他人的经验）去做就行了——这是经验主义的态度。这两种态度，实质上都是主观主义的态度。毛泽东极力反对这种态度，明确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

早在学生时代，毛泽东就主张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重视了解中国地盘内的情形。他曾通过“游学”的方式，深入农村、工厂，接触农民、工人。为了了解中国国情，他连出国留学的机会都放弃了。参加革命之后，他更加珍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并加以反复强调。1929年12月，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这就是“古田会议”。在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毛泽东提出了根据实际情况讨论问题的主张。1930年5月，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文章，特别地强调了根据实际情况执行上级指示。特别是在1936年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他结合战争问题，更多地论述了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总之，如果我们打开《毛泽东选集》，就会发现，关于从实际出发原则的论述，可以说随处可见。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至少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从理论上说，他认识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教导我们说：应当从客观存在着的实际事物出发，从其中引出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799页）又说，“马克思主义叫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853页）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二是从实践上说，毛泽东认识到，不从实际出发，就做不好事情。他明确说过：“大家明白，不论做什么事，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171页）因此，要使事情办得成功，就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毛泽东之所以能引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

2. 在我们的头脑以外

从实际出发，首先应当对客观实际这个概念的含义有个明确的规定，就

是说，要搞清楚什么是客观实际。

对此，毛泽东有个很明确的说明。他说：“除了我们的头脑以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182页）

毛泽东所讲的客观实际，与他在其他地方提到的“客观的真实情况”、“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客观存在的事实”、“实际情况”等等，是同等程度的概念，含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既包括物质现象，也包括研究主体以外的精神现象。例如人们的愿望、要求、觉悟程度、思想情绪和精神状态等等。比如：对于领导者这个研究主体来说，从实际出发，就要关心群众生活，照顾群众的情绪，顾及群众的觉悟，不能做那些群众不愿干、不能干的事情。又比如，对战争指挥员这个研究主体而言，从实际出发，就要做到知己知彼。所谓知己知彼，就是“摸熟了自己的部分（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又摸熟了敌人的部队（同样指挥员、战斗员、武器、给养等等及其总体）的脾气，摸熟了一切和战争有关的其他的条件如政治、经济、地理、气候等等”（180—181页）。

客观实际，既包括现状，也包括历史，就是说，历史发展也是一种实际。例如，中国的国情，就不仅指今天的中国，还指昨天的中国，不仅指中国的现状，还包括中国的历史。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534页）。所以，既要注意研究现状，又要注意研究历史。客观实际是历史和现状的统一。

总之，毛泽东使用的客观实际这个概念，含有多方面的内容，它既可指物质现象，又可指精神现象；既可指现实的事物，又可指历史的状况。但不管指哪种情况，客观实际都是相对研究主体而言的，都是在研究主体之外、不依赖研究主体的客观存在。

毛泽东所说的研究主体，也是多样性的统一。它可以是一个人，如一位领导者、一位科学家、一个群众，也可以是一个集体，大至一个国家的人民甚至整个人类，小至一个班组、一个党团支部。它可以是工人、农民，也可以是士兵、知识分子，还可以是工商业者、科学研究和理论工作者。但是，不管怎样复杂多样，研究主体总是相对于具体的客观实际，总是从事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的人们。

3. 人为什么会犯错误

毛泽东说过，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是的，世界上没有不犯错误的人，有的犯这样的错误，有的犯那样的错误；有的错误轻些，危害不大；有的错误重些，后果严重。那么，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应当说，每一个错误都有其具体的、直接的原因，因此，毛泽东强调，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当进行具体的分析。然而，从哲学上看，任何错误，又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毛泽东也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1936年12月，毛泽东为了总结第二次革命战争的经验，写下了一部著名的军事的也是哲学的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其中，他结合战争中的胜败问题指出：“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人办一切事情都难

免这种情形，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罢了。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179页）

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领导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1308页）

195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继承党的传统问题时，指出：“所谓犯错误，就是那个主观犯错误，那个思想不对头。”《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他还认为，“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同上）。

不难看出，毛泽东告诉我们：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呢？从哲学根源上说，就是因为主观想象不符合客观实际，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因此，要想主观上不犯错误，根本的一条，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好好地符合起来。所谓使二者符合起来，就是使主观符合客观，也就是从实际出发。

4. 应当从哪里着眼

“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是毛泽东在说明如何研究战争规律时提出来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他说：“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从时间的条件说，战争和战争指导规律都是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阶段。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和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有各有其特点，同样不能呆板地移用。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173页）

研究战争规律，为什么要着眼其特点呢？这是因为，战争规律既是多种多样的，又是分层次的。不同的战争规律，具有不词的情形和性质，也就是说，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战争的规律，既有别于其他事物的规律，也不同于特殊的革命战争规律和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规律；革命战争规律，比较一般的战争规律，又有它的特殊情形和性质，具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中国革命战争，比较一般的战争、一般的革命战争，又有它的特殊的情形和性质。因此，在一般战争和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的规律。所以，指导战争的人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要把握不同战争规律的不同特点，否则，就不能打胜仗，而只能吃败仗。

研究战争规律，为什么又要着眼其发展呢？这是因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173—174页）如果不注意规律的发展，而只是机械地对待它们，那么，也不能打胜仗，而只能吃败仗。

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方法论原则，虽是就战争问题提出来的，但是却有着普遍的意义。实际上它是实事求是思想的体现。任何事物都具有不同于其他事物的特点，否则，它就不成其为这种事物；任何事物又都是变化发展的，并且总是作为过程而向前发展的。因此，要想做到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必须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5. “三打祝家庄”的启示

“三打祝家庄”是著名小说《水浒传》里描述的一个故事，说的是，离梁山泊不远有个祝家庄，庄里有个称霸一方的大地主祝朝奉。他仗着地形复杂、民团剽悍、教师爷栾延玉及自己的三个儿子本领高强，处处与梁山泊作对，双方矛盾越来越尖锐，终于爆发了战争。宋江带领人马前去攻打。屯驻之后，先派杨林、石秀化装入村探路。次日，传来杨林被捉、石秀下落不明的消息。宋江大怒，下令立即进兵，誓死要救出二人。结果，由于敌情不明，一打祝家庄宣告失败。失败教育了宋江，使他明白随心所欲地打仗是要吃大苦头的。于是，开始认真地把目光转向客观实际。那杀得他心惊胆战的盘陀路使他记忆犹新，便想方设法摸清了盘陀路的虚实。他下令更添水军作战，迅速地发动了第二次进攻。结果呢？二打祝家庄又失败了。

两番进攻，两番失利，宋江发起愁来：“似此如之奈何？”这时，恰好军师吴用引援军赶到，并带来刚起义来归的登州军马提辖孙立及数条英雄好汉。梁山头领们冷静地总结了两次失败的原因。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长短优劣，制定出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全面的作战方针。一切准备停妥之后，发动了第三次进攻，结果终于大获全胜。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毛泽东总结这个例子的经验时指出：“《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313页）这里，毛泽东用三打祝家庄的例子向人们说明：办任何事情，都应当从实际出发，而且要从全面的实际出发。宋江一打祝家庄，只是感情用事，没有从实际情况出发，结果就不能不失败；二打祝家庄，虽然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了解了某些实际情况，但只是片面的了解。例如：只了解盘陀路秘密一方，不了解芦苇草丛中秘密一方；只了解独龙岗前防守严整一方，不了解独龙岗后防卫森严一方；只了解对付祝家庄一方，不了解警惕扈家庄一方，如此等等。这样，二打祝家庄也不得不以失败告终。三打祝家庄所以成功，关键在于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了解了客观实际情况。

根据“三打祝家庄”的启示，毛泽东要求人们应该记住列宁的话：“要真正地认识对象，就必须把握和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我们决不会完全地做到这一点，可是要求全面性，将使我们防止错误、防止僵化。”（313页）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坚持实事求是，切记不要忘记这句话。

6. 为什么没有把握呢

在《实践论》这部著名的哲学著作里，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常常听到一些同志在不能勇敢接受工作任务时说出来的一句话：没有把握。为什么没有把握呢？因为他对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和环境没有规律性的了解，或者他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这类工作，或者接触得不多，因而无从谈到这类工作的规律性。及至把工作的情况和环境给以详细分析之后，他就觉得比较地有了把握，愿意去做这项工作。如果这个人在这项工作中经过了一个时期，他有了这项工作的经验了，而他又是一个肯虚心体察情况的人，不是一个主观地、片面地、表面地看问题的人，他就能自己做出应该怎样进行工作的结论，他的工作勇气也就可以大大地提高了。只有那些主观地、片面地和表面地看问题的人，跑到一个地方，不问环境的情况，不看事情的全体（事情的历史和全部现状），也不触到事情的本质（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就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起来，这样的人是没有不跌交子的。”（289 - 290 页）

这里，毛泽东告诉我们，做事情，要从不把握到有把握，要成功而不失败，必须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深刻地而不是表面地掌握事物的实际情况，特别是掌握事物的规律性。否则，就既不能实现从不把握到有把握的转变，也免不了吃苦头，跌交子。

7. 从“是什么”和“不是什么” 到“怎样做”和“不怎样做”

“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说的是客观实际的情况，特别是事物的客观规律；“怎样做”和“不怎样做”，说的是人们要采取的战略、策略，使用的方法，走的路线等等，也就是主观指导规律。从“是什么”、“不是什么”到“怎样做”、“不怎样做”，实质上就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客观规律到主观指导规律。也就是从实事中求出规律来，然后，按照客观规律指导人们的实践。这是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在实践中，既注意了解客观实际的“是什么”、“不是什么”，又重视在这个基础上探讨“怎样做”和“不怎样做”，并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一点，在《论持久战》中阐述得尤其出色。

首先，毛泽东具体考察了中日双方的实际情况（日本方面，具有强大、退步、国小、寡助等特点；中国方面，具有弱小，进步、国大，多助等特点），揭示了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这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是什么”和“不是什么”的问题。

其次，根据中日双方的特点和抗日战争的客观规律，毛泽东揭示出抗日战争的主观指导规律（这就是：战略上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战役和战斗上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从而解决了抗日战争中“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

毛泽东成功地解决了抗日战争中的“是什么”、“不是什么”和“怎样做”、“不怎样做”的问题，既指导了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又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正确地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原则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8. 打倒主观主义

毛泽东一生反对过许多错误观点或倾向。在哲学上，他最反对的，或者说他反对得最坚决、最强烈的，恐怕就是主观主义了。

所谓主观主义，是毛泽东对实际工作中的唯心主义的一种表述。它不是作为一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出现的，而是常常以主观片面的思想方法和作风表现出来。主观主义和实事求是根本对立的。毛泽东在弘扬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总是强调反对主观主义。

早在1929年，毛泽东为古田会议写的决议中，就尖锐地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问题。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对主观主义也作了深刻的批判。1937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中，从哲学的高度对主观主义作了精辟的分析。1942年，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等整风文献中，对主观主义的表现形式、思想根源、对革命事业的危害以及克服的办法等等，都作了充分的论述。

毛泽东指出，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另一种是经验主义。前者的主要特点是：一切从书本、定义、公式出发，反对理论联系实际；只要死记硬背、生搬硬套，不要从实际出发，不顾及客观的具体情况；把真理看成是主观自生的、千古不变的，不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否认理论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后者的主要特点是：只要感性经验，不要理性认识，拘泥于局部经验，坐井观天。不能通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

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出发点不同，表现形式不同，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但是，在思想方法的本质上，两者都是一致的，他们都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割裂开来；他们都违背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把片面的相对的真理夸大为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们的思想都不符合客观的全面的实际情况。一句话，他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

主观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明确指出：主观主义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总之，这种反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大敌当前，我们有打倒它的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800页）。

那末，怎样才能打倒主观主义呢？毛泽东着重地指出如下几点：

首先，要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毛泽东指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827页）尊重唯物论，就是要以认识的客观性来反对认识的主观性，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尊重辩证法，就是要以认识的全面性和深刻性来反对认识的片面性和表面性，按照辩证法的方法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

其次，要加强调查研究。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怎样纠正这种本本主义？只有向实际情况作调查。”“必须努力作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112页）

最后，要对症下药。毛泽东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必须使上述两种人各向自己缺乏的方面发展，必须使两种人互相结合。有书本知识的人向实

际方面发展，然后才可以不停止在书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818—819页）

毛泽东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思想，为我们在实践中防止、克服主观主义提供了有力的武器，指明了努力的方向。

三、神奇的演员——自觉能动性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毛泽东

1. 蜘蛛、蜜蜂、人

人的能动性，是一个同人们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可惜的是，在马克思主义之前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对这个问题没有做出科学的说明，只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这个问题才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

马克思曾从人活动的目的性的角度，把人与蜘蛛、蜜蜂相比较，说明了人的能动性。他说：“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资本论》第1卷，第202页）列宁则从意识创造性的侧面论述了人的能动性。他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38卷，第228页）

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毛泽东将人们能动地反映客观世界和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和能力，叫做自觉的能动性，明确指出自觉性是人的能动性的特点，也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大贡献，也符合于客观的实际情况。

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个不断运动变化着的物质世界，即使非生物也处于不停的运动变化之中。不过，非生物虽然在不断地运动变化，但它没有自觉性和主动性，即没有能动性。动物能够以自己的存在和活动影响周围环境，特别是高等动物，能够进行简单的联想，有的还能模仿人的动作。但动物的所有这些活动，基本上出于本能，完全是盲目的、不自觉的，它们并不会意识到自己行动的意义和后果。因此，动物只能适应自然，受自然的支配，而它们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与自然不同，人不是消极地适应自然，而是积极能动地改造自然、支配自然。人的能动性是自觉的，正是他比动物高明的地方。

2. 自觉能动性结构之谜

毛泽东不仅指出了自觉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而且具体解开了自觉能动性结构之谜。

首先，毛泽东指出，在内容上，自觉能动性分为思想和实践两个方面。他说：“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477页）思想是自觉能动性的一个方面。思想的能动性就在于使人通过对客观实际情况的分析和认识，看清事物发展的根本趋势，预见事物发展的大体过程。但是，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要实现思想，需要有自觉行动着的人。做或行动是自觉能动性的另一个方面，而且

是更为重要的方面。

其次，毛泽东认为，在性质上，自觉能动性分为正确的和错误的两个方面。所谓正确的自觉能动性，就是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正确的思想和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正确的行动；反之，一切不根据和不符合于客观事实的错误思想和一切根据于错误思想的错误的行动，就是错误的自觉能动性。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发扬根据和符合于客观实际的自觉能动性，即正确的自觉能动性。

最后，毛泽东还指出，在主体上，自觉能动性分为个体和群体两个方面。个体的自觉能动性，不仅指领袖、杰出人物、领导干部等个体，而且包括作为普通群众一员的个人。例如，一个领导者，应当担负好自己的领导责任；一个战争指挥员，要变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一个普通群众，也要尽力而为，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群体的自觉能动性，主要指群众的自觉能动性。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477 - 478 页）

3.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毛泽东在其哲学著作特别是在军事著作中，具体分析了预见性、计划性、灵活性和主动性等自觉能动性的表现形式。

预见性是自觉能动性的首要表现。所谓预见性，就是人们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对事物发展趋势做出判断的才能。毛泽东认为，预见性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在日常生活中，农民春耕下种，秋季收获，工人工作，医生下药，都是因为有所预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见性关系到事情的成败，决定着人们活动的方向。缺乏预见，行动就会是盲目的、无目的的活动。盲目性是不自由的表现，并必然导致事情的失败。可见，预见性是人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中取得自由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预见性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指出，世界上的事物，都不是神物，乃是世界的一种必然的运动，有规律可循。所以，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

当然，人的预见性不是万能的。由于客观情况变化的复杂性和主体认识能力在一定条件下的受限性，人们的预见性又是有限度的。人们对“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106 页）。就抗日战争而言，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客观现实的行程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个抗日战争的“流年”来，而只能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

预见性在实践中的具体化，就是计划性。所谓计划性，就是人们在做或行动之前能够预先拟定行动的具体内容和步骤的性能。无论办什么事，“事先都应有尽可能的周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行动的预先准备工作”（414 页）。毛泽东在谈到战争问题时指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495 页）战争如此，其他实践活动也是如此。

计划性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毛泽东认为，计划之所以可能，除主观因素外，其客观依据是事物都具有相对稳定性一面。例如战争，虽没有绝对

的确实性，但却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我之一方是比较地确实的。敌之一方很不确实，但也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后现象可供思索。这就构成了所谓某种程度的相对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495页）但由于战争情况只有相对的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特点，战争的计划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修改，不这样做，就变成机械主义者。然而，决不能因此否认一定时间内的相对的固定的战争计划，否认了这一点，就否认了战争本身。“在绝对流动的整个战争长河中有其各个特定阶段上的相对的固定性——这就是我们对于战争计划或战争方针的根本性质的意见。”（496页）毛泽东对于战争计划性的分析，具有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4. 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毛泽东认为，自觉能动性还表现为主动性和灵活性。所谓主动性，就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能够造成有利局面，使事情按照自己的意图进行的性能。主动是相对于被动而言的。主动性程度越高，被动程度就越低；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主动性的大小标志着人们活动的自由程度的高低。就战争而言，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487页）

毛泽东结合战争问题，说明了怎样取得主动性。他说，主动权不是任何天才家所固有的，只是聪明的领导者虚心研究和正确估计客观情况正确地处置军事政治行动所产生的东西。因此是要有意识地去争取的东西，不是现成的东西。不合客观情况的悲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消极的处置，无疑地将丧失主动权，把自己抛于被动地位，但是同样，不合实际情况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和随之而来的冒险的处置，也将丧失主动权，而最后归于悲观者一路。不仅战争活动是这样，其他活动也莫不如此。

主动性在实际活动中的具体实现，就是灵活性。或者说，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实践中的东西。毛泽东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494页）灵活，是聪明的人们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主观盲目性，是一种不自由的表现。灵活性“这种善观风色和善择时机的聪明是不容易的，惟有虚心研究，勤于考察和思索的人们可以获得。为使灵活不变为妄动，慎重地考虑情况是必要的”。（414页）

自觉能动性的几种具体表现，预见性、计划性、主动性、灵活性等，不是孤立的，而是有机联系着的。主动性的获得，有赖于灵活性和计划性；灵活性和计划性的实行，正是为了达到主动性。而预见性是计划性、主动性和灵活性的基础或前提。这“四性”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了人的能动性的自觉性。

5. 怎样才能得到预想的结果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做什么事情，人们往往都有个预想的结果。例如，学生考试，都预想成绩优秀或得满分；战士打靶，总预想取得弹弹中靶的结

果；工人做工，总想在最短的时间里生产出量多质优的产品；农民种地，总是预想获得好收成。预想的结果人人有，那么，怎样才能得到呢？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处理好自觉能动性与客观规律的关系。对此，毛泽东做出了既唯物又辩证的说明。

一方面，发扬自觉能动性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就是说，尊重客观规律是有效地发挥自觉能动性的前提。这是因为，客观规律给自觉能动性的发扬提供了可能。换言之，正是因为事物有规律可循，才使自觉能动性的发扬成为可能。客观规律性还给自觉能动性的发扬规定了限度和方向。就规定的限度而言，规律作为事物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体现着事物发展中只能如此、一定贯彻下去的基本趋势，所以，自觉能动性所起的作用，只能是最大限度地加速或延缓事物发展的进程，而不能改变事物发展的基本方向。就规定的方向而言，自觉能动性的发挥不是任意的，而是要符合规律的要求，按规律办事。规律只能遵循，不能违背；违背了，就要受到惩罚。毛泽东明确指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284页）

另一方面，要正确地认识和利用客观规律，又有待于自觉能动性的发扬。规律是事物内部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它不是单凭消极静观所能认识的。要认识规律，就要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并要善于将在实践中得到的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使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才能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性。认识规律不容易，而要利用规律就更不容易，更需要发扬自觉的能动性。例如，“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是客观规律。但这个规律要靠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能动性才能实现。“坐着不动，只有被灭亡，没有持久战，也没有最后胜利。”（478页）“世界上的事情，都是这样。钟不敲是不响的。桌子不搬是不走的。苏联红军不进入东北，日本就不投降。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1132页）可见，认识和利用规律都要靠自觉能动性，否则，是任何一件小事也办不成的。

6. 演员、舞台、戏剧

正确而有效地发扬自觉能动性，不仅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的关系，而且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觉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对于后一种关系，毛泽东曾在其军事著作中以演员与舞台的关系做了很精彩的说明。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毛泽东写道：“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在既定的客观物质的基础之上，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就要发挥他们的威力，提挈全军，去打倒那些民族的敌人，改变我们这个被侵略被压迫的社会国家的状态，造成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里就用得着而且必须用我们的主观指导的能力。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

发展的能力。”（478页）这里，虽然说的是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但就自觉能动性与客观条件的关系而言，却具有普遍意义。

毛泽东认为，像演员演戏需要舞台一样，人的自觉能动性的发挥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没有舞台，就不能演戏；没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就没有用武之地，自觉能动性就不可能得到发挥。客观物质条件限制着自觉能动性的发挥，或说自觉能动性受制于客观物质条件，这是二者关系的一个方面。

但是，自觉能动性并不是机械地决定于客观物质条件，它能够在既定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大显身手，即根据规律的要求和实践的需要，创造和改变条件。创造条件，利用规律，这是两者关系的又一个方面。

毛泽东把自觉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条件的关系，形象地比做演员和舞台的关系，说明他是有条件论，但又不是唯条件论，从而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自觉能动性和客观物质条件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正确发扬自觉能动性，从根本上指明了方向。

7. 闪光的新观点

毛泽东在说明自觉能动性和客观规律、客观条件的关系时，在前人的基础上深入一步，提出了一个闪烁着真理光芒的新观点，这就是：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在说明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时，就初步地论述了这种观点。他说：“革命斗争中的某些时候，困难条件超过顺利条件，在这种时候，困难是矛盾的主要方面，顺利是次要方面。然而由于革命党人的努力（着重号是笔者所加，下同），能够逐步地克服困难，开展顺利的新局面，困难的局面让位于顺利的局面。1927年中国革命失败后的情形，中国红军在长征中的情形，都是如此……在相反的情形之下，顺利也能转化为困难，如果是革命党人犯了错误的话。1924年至1927年的革命的胜利，变为失败了。1927年以后在南方各省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至1934年都失败了。”（324-325页）这里，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说明：在困难和顺利、胜利和失败的相互转化中，自觉能动性可以起主要的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接着指出：“研究学问的时候，由不知到知的矛盾也是如此。当着我们刚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无知或知之不多的情况，和马克思主义的知识之间，互相矛盾着。然而由于努力学习，可以由无知转化为有知，由知之不多转化为知之甚多，由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盲目性改变为能够自由运用马克思主义。”（325页）

特别是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论述得更为明确，更为充分，也更为精彩。为了说明这一点，下面不妨多引证几段论述。他说：

“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478页）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

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487页）

“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490页）

“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须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或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491页）

毛泽东的有关论述还很多，引出以上几段，已经足以说明：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是毛泽东极为重视并加以反复强调的观点。他虽然是结合具体问题，特别是结合战争问题论述的，但是，就其基本道理而言，却是普遍适用的。

8. 奇怪吗？——强大之军打败仗、 弱小之军打胜仗

对于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的观点，毛泽东还以中外历史事实作了论证。

他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楚汉成皋之战，韩信破赵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外国如拿破仑的多数战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内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491页）

事实果真是如此吗？回答是肯定的。下面，仅以“韩信破赵之战”为例，略作说明。

公元前204年，汉将韩信率部与赵王歇大战于井陘（今属河北省）。在大战开始以前，汉军完全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人数少（只有几万人），粮食不足，地形不利，行军疲劳，立阵匆忙；赵军却完全处于优势和主动地位：人数多（号称20万，数倍于汉军），粮食充足，地形很好，立阵较早，能够以逸待劳。从表面上看来，失败的应该是汉军，胜利的应该是赵军。但是，战争的结果，恰巧相反，汉军获得大胜，赵军遭到惨败。这是什么原因呢？

汉军获胜的决定性原因，是韩信重视了解情况，懂得从实际出发，采用一切手段，争取主动权。一句话，韩信正确地发扬了自觉能动性。

赵军惨败的决定性原因，则是赵将陈余死抠兵书，不接受正确意见，不切断汉军后路和粮食供应，不突击在匆忙中立阵的汉军，不提防敌人偷袭自己的壁垒。一句话，陈余错误地发扬了自觉能动性。这样，赵军就放弃了主

动，变成被动；失掉了优势，变成了劣势。

仔细考察便可发现，毛泽东上面论列的其他的历史事实，也都证明自觉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起决定作用。总之，这个观点，是一个极为科学的论断，对于指导人们的实践具有难以估量的意义。

四、奇特的桥梁

——实践第一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排斥一切否认实践重要性、使认识离开实践的错误的理论。

——毛泽东

1. 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什么是实践？马克思把实践看作“人的感性活动”。恩格斯将实践与实验和工业生产等同。列宁则将实践与生活并提，把实践看作主体与客体的“交错点”。这些提法，虽不完全一致，但意思大体相似。

毛泽东继承并进一步发挥了马、恩、列的思想，对于实践概念的含义作了较为明确的规定。他认为实践就是“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是人类自觉的能动性的表现。

实践是人的一种活动，人在活动中，首先有思想指导，然后通过身体四肢等动作，或借助于工具，作用于物质世界。因此，实践中既有主观性，又有客观性。人在实践中表现了积极的能动作用，但从其结果来看，实践既是人的活动，那它的客观性就是主要的。凡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一切活动，都是实践。因此，实践是人们自觉地改造客观世界的一切做或行动。这是一种客观性的活动，而不是停留在主观范围内的观念活动。

实践既然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那么，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就是实践的一个重要特点。和动物本能的活动不同，人类的实践活动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人类不仅能够适应世界，而且能够遵循客观规律能动地改造世界。一些动物奇特的本能活动虽然使人惊叹，但是它毕竟与人类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有着天壤之别。因此，实践是一种有目的、积极能动的活动，而不是一般动物式的、本能的适应环境的活动。

毛泽东不仅看到了实践的客观性、能动性，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实践的社会性。他不仅将实践看作认识论的范畴，而且首先看作历史唯物论范畴，他强调指出，实践总是在人们结成的一定社会关系中进行的，是社会的实践。劳动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旧唯物主义之所以不能了解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不能科学地解决认识论问题，其原因就在于它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它们不懂得实践的社会性和历史性。

毛泽东认为，实践是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这种活动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有变革社会的活动（在阶级社会里，主要是阶级斗争），教育活动，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等。“总之社会实际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283页）

实践活动的形式虽然是多种多样的，但不同的活动形式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不同的。毛泽东认为，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中，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决定社会生活的三项基本活动，他称之为伟大的三大革命实践。其中，毛泽东把生产活动看作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我们通常讲投身于实践，主要指投身于三大实践，并且首先是指投身于生产斗争实践。

2.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毛泽东认为，有几种不同的回答：

第一种回答，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种观点，在哲学上叫做“客观唯心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哲学家，说法也不完全相同，例如，19世纪德国的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绝对观念”那里来的。中国宋朝时代，有个学派叫程（程颢、程颐）朱（朱熹）理学，他们认为“理在事先”，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理”那里来的。所谓“绝对观念”，所谓“理”，就是宗教所说的“上帝”、“玉皇大帝”之类的迷信妄说。因此，这种回答是错误的。

第二种回答，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这种观点，叫做主观唯心主义。在哲学史上，主张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花样繁多。18世纪的英国大主教、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奥地利的物理学家、主观唯心主义者马赫说：“物是感觉的复合。”意思是说，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都是他的感觉产生的，有了他的感觉才有客观世界。在中国历史上，也有不少主观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宋朝的陆象山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明朝的王守仁进一步发挥说，“心外无物”、“心外无事”。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说到底，必然导致“唯我主义”，即有了“我”的感觉、“我”的心，才有客观世界，反之便没有一切。这种观点，当然是非常荒谬的。

第三种回答，认为人的正确思想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主观自生的，而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这种观点，叫做唯物主义的反映论。中外哲学史上，有许多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都详细地论证了这种观点。通俗地说，这种观点把人的认识比做照镜子或照相，外界存在的客观事物照在镜子中，才有这个事物的映像。用照镜子或照相作比喻，说明人的认识是客观外界的反映，这一点是正确的，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照镜子或照相只能反映事物的外表，而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这又是它的不正确的地方。所以，人们把这种观点叫做旧唯物主义即机械唯物主义的观点；这种认识论叫做直观反映论。这种观点或认识论，既有正确的一面，又存在严重的缺陷。

上述三种看法或观点，都没有也不可能正确或完全正确地回答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问题。那么，正确的回答是什么呢？毛泽东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9页）简而言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这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即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观点，也是唯一正确的观点。

3. “知识里手”为什么可笑

“里手”，湖南方言内行的意思。知识里手，指很有知识、很内行的人。毛泽东在知识里手四字两边加上引号，是指那些实践经验不多、只有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而又不量力自封为天下第一的人。毛泽东认为，这种人是最可笑的。这是为什么呢？

毛泽东认为，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

决定的需要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你要知道原子的组织和性质，你就得进行物理学和化学的实验，变革原子的情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

当然，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在古人在外人是直接经验的东西，如果在古人在外人直接经验时，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的事实，那么这些知识是可靠的，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所以，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了这个感觉，否认了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他就不是唯物论者。“知识里手”之所以可笑，原因就在这个地方。

可见，要成为真正的知识里手，还是应当投身到实践中去。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语出《后汉书·班超传》。东汉班超奉命率 36 人出使西域，在鄯善国受到热情接待。但是不久，国王就怠慢起他们来，经了解，才知道是汉朝的敌人匈奴的使臣也到了这里，国王不知顺从哪一方好，所以态度就发生变化。班超立即召集同来的 36 人计议。他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连夜杀了匈奴派来的人，这样鄯善国才会诚心归顺汉朝。否则，大家只有死路一条。当夜，班超率众袭杀了匈奴 100 多人。国王大惊，马上表示要永远同汉朝友好。班超等也重新受到热情的款待。“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后人又写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意思是，不入虎窝，怎么能捉到小老虎呢？比喻不冒危险，不经历艰苦的实践，就不能获得成功。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引用了这一用语，说明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的道理。他说：“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288 页）

为什么人的认识只能来源于实践呢？这是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使人的认识开始发生，开始从客观外界得到感觉经验。”（290 页）“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286 - 287 页）。可见，实践之所以是认识的来源，是因为实践起到联系主、客观桥梁的作用。通过这座桥梁，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沟通起来，才产生认识。除此之外，再没有第二个途径。

5. 巨大的动力

毛泽东认为，来源于实践的认识，必将随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又是认识发展的推动力量。“人类社会的生产活动，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因此，人们的认识，不论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

会方面，也都是一步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即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的方面。”（283页）

人类的认识史表明，实践不断向人们提出新课题、新任务，促使人们去思索、去研究、去解决；实践又不断给人们提供新经验，供人们去吸取、去总结；实践还不断为人们提供新的认识工具，供人们去使用，提高了人们的认识能力，弥补生理感官的不足，推动认识不断地向前发展。在古代，适应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出现了天文学、气象学和数学。近代，适应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需要，建立了真正的自然科学。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只限于片面的了解，原因之一，就在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才出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而马克思、恩格斯也受实践条件的限制，他们“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287页）

可见，认识任何时候都离不开实践这个基础，它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6. “有用”、“有权”就是真理吗

自古以来，人们对有没有一个衡量真理与谬误的客观标准，众说纷纭。在实际生活中，常常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知道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

历史上，许多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也是长期争论不休，找不到一个客观的标准。在中国，有人说“圣王之言”是标准；有人说“以孔子是非为是非”。在外国，有人说“圣经”是标准；又有人说“有用就是真理”。还有，中外都有人主张“有权就是真理”，甚至有人干脆说根本没有标准，无是无非。

其实，历史上，也有较为高明的人，提出了比较正确的见解。唐朝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名诗：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

白居易已在某种程度上懂得了判别是非的客观标准。

在理论上完全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个人是马克思。他在1845年就说：“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并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页）

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观点，而且进一步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说：“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663页）又说，“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

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284页）还说，除了实践，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这里所说的“只有”、“只能”、“此外再无”，都是说的真理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

为什么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呢？这是由真理的本性和实践的特点决定的。

所谓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里的正确反映，而谬误则是对客观世界的歪曲反映。既然如此，要判断主观认识是否正确，即是否同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符合，这在意识范围内是决然不能解决的。因为认识本身不能检验自己的对错，真理和真理标准是两回事。同时，客观事物本身也不具有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的本领，因而客观事物本身也不直接回答认识的对错。要检验认识的对错，必须找到能将主观与客观联系起来、沟通起来的桥梁。而实践，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具有沟通主观和客观的桥梁作用。

可见，实践，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客观标准。毛泽东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7. 束之高阁的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认识不仅有“从哪里来”，而且有“到哪里去”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的观点。

毛泽东认为，认识对实践的依赖，不仅表现在认识来自实践、随实践发展、并受其检验，还表现在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来自实践的认识，还要回到实践中去，为实践服务。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292页）又说，“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而认识本身不能实现什么东西，要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认识就要回到实践中去，化为物质力量。从实现认识的目的上说，实践又是认识的归宿。就理论而言，“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理论是重要的，它的重要性充分地表现在列宁说过的一句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然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末，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292页）

总之，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只有实践，才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8. 天才的秘密

天才，是大家都感兴趣的东西，可以说，谁都希望自己有天才，谁都想成为天才人物。然而，什么是天才？它是从何而来的？却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

天才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曾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先秦的孔孟，宋明的理学家，都主张天才是与生俱来的，有生而知之的圣人。有些唯物主义哲学家，对这种唯心主义的天才论进行了一些批驳，但由于他们受历

史条件的限制，不懂得认识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都没能对天才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毛泽东运用实践第一的观点，对天才问题给予唯物辩证的说明，从而揭开了天才的秘密。

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并不否认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才能高一点。但是，人的才能，既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就是说，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后天才有的，是在长期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世界上决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圣人。马克思主义决不是马克思个人头脑的自由创造，而是适应 19 世纪 40 年代的工人阶级斗争的需要和科学发展的要求而产生的。“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欢迎这个理论，丝毫不存什么‘先哲’一类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头在里面。”（111 页）天才不是靠一个人、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一个阶级，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泽东一贯认为，力量存在于群众之中，智慧来自群众的实践。天才并不神秘，天才人物也不是从天而降，高不可攀，不过是善于总结实践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罢了。

当然，毛泽东并不否认个人在知识、才能上的差别。他说，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人办一切事情都有比较地会办和比较地不会办之分，就是承认人在才能上有差别。但是，他同时认为，一些人所具有的特异素质，或者说天才条件，能否在以后得到充分发挥，主要取决于后天实践的广度和深度，取决于在实践中发扬自觉能动性的程度。也就是说，人的才能的差别主要是由于实践条件不同和主观努力不同造成的。一个人即使具有最优秀的生理素质，若不从事学习和相应的实践活动，他的智力也是发展不起来的。宋代王安石写过一篇《伤仲永》的短文，说的是，江西金溪有个方仲永，小时很聪明，但由于他只是到处卖弄聪明而不认真学习，到 20 岁左右就成为一个很平凡的人了。就是无产阶级的伟大天才人物，要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也不能离开社会实践。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287 页）

可见，实践出智慧，实践长才干，离开社会实践，就不会有任何天才。天才就在实践中。

五、无限的飞跃 ——认识运动的规律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毛泽东

1. 考察团先生们的认识是怎样提高的

毛泽东认为，人们的认识，不论是对于自然界方面，对于社会方面，都是一步又一步地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一般说来，对于一个具体事物的认识，从开始到完成，认识本身的发展要经过两次质的飞跃，即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

第一次飞跃，即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是怎样实现的呢？毛泽东以当时来延安考察的考察团先生们认识的提高为例，作了透彻的说明。

30年代中期到40年代末，延安一直是陕甘宁边区的首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国内外一切进步的人们热切向往的地方。为了了解中国革命，了解中国共产党，常有许多国内外考察团赴延安考察。

正如人们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一样，考察团先生到延安考察，头一两天，他们看到了延安的地形、街道、屋宇，接触了许多的人，参加了宴会、晚会和群众大会，听到了各种说话，看到了各种文件，这些都是事物的现象，事物的各个片面以及这些事物的外部联系。这叫做认识的感性阶段，就是感觉和印象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人们还不能造成深刻的概念，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第二个阶段。考察团先生们在他们集合了各种材料，加上他们“想了一想”之后，他们就能够作出“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彻底的、诚恳的和真实的”这样一个判断了。在他们作出这个判断之后，如果他们对于团结救国也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就能够进一步作出这样的结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能够成功的。”这个概念、判断、推理的阶段，在人们对于一个事物的整个认识过程中是更重要的阶段，也就是理性认识阶段。这个阶段的认识，到达了事物的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东西，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完成了认识的真正任务。

不难看出，认识的第一次飞跃，是通过两个阶段实现的：“第一步，是开始接触外界事情，属于感觉的阶段。第二步，是综合感觉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属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阶段。”（200页）考察团先生们认识的提高，就是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2. 奇妙的“16字诀”

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离不开对感觉材料的整理和加工。那么，这个工作应当怎样做呢？毛泽东提出了“16字诀”的思维方法。

在《实践论》中，他说：“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291页）

“去粗取精”，就是要通过分类、比较的方法，抓住最能反映本质的典型材料，扬弃那些粗糙的、可有可无的并不反映事物本质的材料。

“去伪存真”，就是运用分析的方法去鉴别材料的真伪性，剥掉虚假的东西，发现事物的真象，不要认假为真，为假象所蒙蔽。

“由此及彼”，就是把来自各个方面彼此孤立的材料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搞清事物的来龙去脉和在空间、时间中的相互联系，不要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更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由表及里”，就是通过事物的外部联系发现事物的内部联系，透过现象看本质，达到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不要浅尝辄止，不求甚解。

毛泽东所说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16字诀，实际上，是唯物辩证法在研究事物过程中的具体运用，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思维方法。它的奇妙之处就在于，如果我们正确地运用它，就能够从现象看到本质，从结果看到原因，从偶然看到必然，从个别看到一般，从暂时看到永久。

3. 意义更加伟大的飞跃

毛泽东在说明了认识过程的第一次飞跃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之后，又论述了第二次飞跃，即从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

他指出，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为什么说第二次飞跃的意义更加伟大呢？在毛泽东看来，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认识运动如果只到理性认识为止，那么还只是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来说，还只说到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认识的第一个飞跃，只是第二个飞跃的准备，第二个飞跃才是认识的真正目的。

二是因为，理性认识是否正确，在理性认识阶段并没有解决，也不可能解决。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将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其是否达到预想的结果，一般地说来，成功了的，就是正确的；失败了的，就是错误的。例如：“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辩证唯物论之所以为普遍真理，在于经过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的不完全性，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292—293页）

总而言之，理性认识只有在第二次飞跃中才能实现其目的，并得到检验和发展，正是第二次飞跃更加伟大的意义之所在。

4. “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说明了什么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党的建立到抗日战争时期，经过了两次胜利，两次失败。北伐战争胜利了，但是到1927年，革命遭到了失败。土地革命战争曾经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红军发展到30万人，但是，后来又遭到挫折，最后剩下不到3万人。

两次胜利，两次失败说明了一个哲学道理：认识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要经过多次的反复。

毛泽东总结中国革命的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时说：“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5—826页）“如果有人问，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6页）他又说：“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践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少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同上）总之，认识具有反复性，这是毛泽东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

坚持认识的反复性原理，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对待错误。一方面，要看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错误总是难免的。任何集团、任何个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应当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另一方面，承认错误难免，决不是宽容错误，更不是任其泛滥。而是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错误，认真分析犯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提高防止错误和克服错误的自觉性，做到少犯错误，不犯大错误，“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1480页）

5. “完成了”与“没有完成”

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再由理性认识飞跃到实践。到这里，认识运动就算完成了吗？毛泽东的答覆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

为什么说完成了呢？毛泽东告诉我们：人们投身于变革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实践中，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的认识由感性的推移到了理性的，造成了大体上相应于该客观过程的法则性的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然后，再应用这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于该同一客观过程的实践，如果能够实现预想的目的，即将预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在该同一过程的实践中变为事实，或者大体上变为事实，那么，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例如，在变革自然的过程中，某一工程计划的实现，某一科学假想的证实，某一器物的制成，某一农产的收获；在变革社会过程中，某一罢工的胜利，某一战争的胜利，某一教育计划的实现，都算实现了预想的目的。尽管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部分地改变的事是常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有的，许多时候须反复失败过多次，才能到达于客观过程的规律性相符合，因而才能变主观的东西为客观的东西，即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到了这种时候，人们对于在某一发展阶段内的某一客观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

为什么又说没有完成呢？毛泽东告诉我们，任何过程，不论是属于自然界的和属于社会的，由于内部的矛盾和斗争，都是向前推移向前发展的，人们的认识运动也应跟着推移和发展。依社会运动来说，真正的革命的指导者，不但在于当自己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有错误时须得善于改正，而且在于当某一客观过程已经比某一发展阶段向另一发展阶段推移转变的时候，须得善于使自己和参加革命的一切人员在主观认识上也跟着推移转变，即使要使新的革命任务和新的工作方案的提出，适合于新的情况的变化。

由此可见，认识运动完成了，又没有完成。矛盾，然而却是客观的事实。

6. 一个规律，四个公式

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揭示出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对于这个规律，他曾从不同的角度，作了精辟的表述。

在《实践论》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296 - 297 页）这一表述，可以归结为“实践——认识——实践”。这是公式一。

在《矛盾论》一文中，他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认识不致变成枯槁的和僵死的东西。这是两个认识的过程：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309—310 页）这一表述，可以归结为：“个别——一般——个别。”

这是公式二。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毛泽东还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去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899页）这一表述，可以归结为“群众——领导——群众”。这是公式三。

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毛泽东又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0页）这一表述，可以归结为“物质——精神——物质”。这是公式四。

四种表述，四个公式，应当说，是有差别的。它们的角度和涉及的关系各不一样：第一种表述和公式一，是从认识论角度，涉及的是实践和认识的关系；第二种表述和公式二，是从辩证法角度，涉及的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第三种表述和公式三，是从历史观角度，涉及的是领导和群众的关系；第四种表述和公式四，是从唯物论角度，涉及的是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因此，不能把它们完全等同起来。

但是，四种表述和四个公式，差别只是形式上、表面上的，在其本质上，又是一致的，它们反映的是同一个规律，在其各个环节上，也都是统一的。因此，不能把它们绝对地割裂开来。在这里，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和历史观实现了完美的结合，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7. “长河”和“水滴”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站在黄河边，不免使人想起大诗人李白的著名诗句：“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毂转秦地雷”；“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河西来决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面对汹涌而来、滔滔而去的黄河水，你想过没有？它竟是由一滴滴的水滴聚合而成的。“长河”与“水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毛泽东看到了、想到了两者的联系，并用这种联系，来比喻真理的发展规律。

毛泽东认为，真理自有真理的发展规律，由相对真理日益走向绝对真理，就是真理的发展规律之一。

他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性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295页）又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296页）这就是说，真理的发展是一个由相对真理日益走向绝对真理的永无止境的过程。这个过程，就像川流不息的长河，人类已经取得的任何一项真理性的认识，都是绝对真理“长河”中的“水滴”。都是无穷的绝对真理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它既是以往实践和认识已经达到的终点，又是进一步迈向绝对真理的起

点。由无数这样的相对真理所构成、所连接的绝对真理之长河，永无止境，万世不竭，永远不会停留在一个水平上。

毛泽东用“长河”和“水滴”比喻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从动态上形象地说明了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的道理。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真理的规律，发现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是十分有意义的。

8. “香花”和“毒草”

毛泽东认为，真理的发展，不但是一个由相对真理日益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同谬误作斗争的过程。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是真理发展的又一个规律。他说：“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又说，“任何时候，总会有错误的东西存在，总会有丑恶的现象存在。任何时候，好同坏，善同恶，美同丑这样的对立，总会有的。香花同毒草也是这样。它们之间的关系都是对立的统一，对立的斗争。”（同上，第416页）

真理性的认识是人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谬误则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两者是对立的，有着明确的界限。但是，两者又发生于同一个认识过程中，有着同一性，相比较而存在，就是同一性的表现。所谓相比较而存在，就是说，二者不仅是互相区别的，而且是互相依赖的。真理和谬误这两个对立的方面，都不能孤立存在，都要以对方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没有真理作比较，就无所谓谬误；反之，没有谬误作比较，也无所谓真理。

真理和谬误的统一性不但表现为互为存在的前提，更重要的还表现为互相贯通，并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即真理转化为谬误，谬误转化为真理。

真理和谬误的转化是斗争的结果，斗争促使转化，推动真理向前发展。毛泽东极为重视真理同谬误的斗争。他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有鉴别，有斗争，才能发展。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说起来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页）又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同上，309页）

为什么真理总是在同谬误斗争中发展呢？这是因为，“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作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历艰苦的斗争”（同上，第388—389页）。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它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

真理和谬误的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除了认识上的原因，还有社会的原因。社会上的落后的、保守的和反动的势力，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常歪曲事实，打击新生力量，压抑新生事物，使得斗争更为曲折和复杂。

总之，真理和谬误的斗争是曲折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但是，不管真理和谬误的斗争多么曲折、复杂、激烈，真理总是要战胜谬误。因为真理性认识符合客观事物及其发展规律，经得住实践的检验，而谬误终

归是要被社会实践所否定的。

不过，“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0页）。明确提出并阐发真理同谬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真理观的一个重要贡献。

六、根本的法则——对立统一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

——毛泽东

1. 没有矛盾的想法是天真的想法

1956年底，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迅速地改变了旧中国的面貌。祖国的更加美好的将来，正摆在人们面前。人民所厌恶的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地进行着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经济兴旺，政治安定，文化繁荣，呈现着一派蒸蒸日上、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认为，我们的社会里已经没有任何的矛盾了。“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72页）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矛盾的想法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天真的想法。”（同上，364页）这种想法，之所以天真，不仅不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而且违背了唯物辩证法矛盾法则（或规律）关于矛盾普遍性原理。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精辟地论述了矛盾普遍性原理。他明确地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305页）也就是说，矛盾无事不在，事物即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又是无时不在，任何时候都有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总之，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存在于事物发展的一切过程中，又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

毛泽东揭示的矛盾普遍性原理要求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存有“无矛盾”的天真想法，而要时刻关注事物发展过程的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学会矛盾分析法，正确分析事物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其将来。这样，才能变被动为主动，从而立于不败之地。

2. 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

了解矛盾的普遍性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认识矛盾的特殊性。毛泽东指出，认识矛盾特殊性之所以更重要，原因在于，它既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又是正确解决矛盾的前提。“如果不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就无从确定一事物不同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就无从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的原因，或特殊的根据，也就无从辨别事物，无从区分科学研究的领域。”（309页）

那么，如何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呢？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

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317页）对矛盾特性，也必须实行具体的分析。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

按照列宁提出的具体事物具体分析的原则，毛泽东指出，应当从五种情形中去分析矛盾的特殊性。这五种情形是：“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317页）

概括这五种情形，就是要从纵横两个方向来认识和研究矛盾的特殊性。

在纵的方向上，就是坚持发展的观点，即动态地研究事物发展全过程中的矛盾以及过程发展的各个阶段上的矛盾的特殊性。

在横的方向上，就是坚持全面的观点，即全面地研究各种运动形式中的矛盾的特殊性，研究矛盾诸方面的特殊性。

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也就是客观性的观点。因为客观事物本身是多方面的统一，并且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因此，毛泽东强调，研究矛盾特殊性，“不要带上任何的主观随意性，而必须从客观的实际运动所包含的具体的条件，去看出这些现象中的具体的矛盾、矛盾各方面的具体的地位以及矛盾的具体的相互关系。”（319页）

毛泽东关于矛盾特殊性五种情形的分析，为我们树立了具体事物具体分析典范。

3.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语出《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二。一次，唐太宗问宰相魏徵：“为人君的怎样才能明达远见？怎样就会昏暗败事？”魏徵回答说：“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就可以明达事理；而偏听偏信就会看不清事物的真相。”同时他举例说明尧、舜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掌握各方面情况，因而治理好了国家。而秦二世、梁武帝、隋炀帝由于偏信宠臣，因而遭到败亡。唐太宗听了连连称是。

不难看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说明办事情要坚持全面性，克服片面性。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个典故，他以此要求人们在分析矛盾特殊性时，要注意每一矛盾的各个方面的特点，克服片面性。

毛泽东指出：“我们从事中国革命的人，不但要在各个矛盾的总体上，即矛盾的相互联结上，了解其特殊性，而且只有从矛盾的各个方面着手研究，才有可能了解其总体。所谓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就是了解它们每一方面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各用何种具体形式和对方发生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的关系，在互相依存又互相矛盾中，以及依存破裂后，又各用何种具体的方法和对方作斗争。研究这些问题，是十分重要的事情。”（312页）

要正确了解矛盾的各方面，一定要克服片面性。所谓片面性，就是不知道全面地看问题。例如，只了解中国一方、不了解日本一方，只了解共产党一方、不了解国民党一方，只了解无产阶级一方，不了解资产阶级一方，只了解农民一方、不了解地主一方，只了解顺利情形一方、不了解困难情形一方，只了解过去一方、不了解将来一方，只了解个体一方、不了解总体一方，只了解缺点一方、不了解成绩一方，只了解原告一方、不了解被告一方，只

了解革命的秘密工作一方、不了解革命的公开工作一方，如此等等。一句话，不了解矛盾各方的特点，这就叫做片面地看问题。或者叫做只看见局部，看不见全体，只看见树木，看不见森林。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

毛泽东接着指出：“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313页）

我们应该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注意把握矛盾的各个方面，切忌片面性。

4. 辽沈战役成功的启迪

辽沈战役是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同国民党军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战役之初，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科学地分析了东北战场敌军的情况：48万敌军分别固守在长春、沈阳、北宁线上的锦州等几个大城市里，正处于顽抗还是逃跑的犹豫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怎样打呢？如果先打长春，就会把沈阳、北宁线上的敌人放跑，增加解放全国的困难；如果先打下北宁线上的锦州，就切断了东北与关内的联系，造成“关门打狗”之势，使龟缩在长春、沈阳的几十万敌人没有退路，我军可来个“瓮中捉鳖”。同时，我军打锦州，敌人为了守住这条逃跑的交通线，必然派兵增援，我军便能回师打援，调动敌人的部署，有利于下一步行动。况且我军打下锦州，可歼灭1/5的东北敌人，瓦解整个东北敌人守城的信心，为整个战役的胜利创造有利的条件。由此可见，先打锦州是辽沈战役的关键。

基于以上分析，毛泽东在《关于辽沈战役的作战方针》一文里，明确提出，“争取在一星期内外攻克锦州”，强调我军“中心注意力必须放在锦州作战方面”，“要用全部精力注于锦州方面之作战”（1337页）。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先打锦州的正确性。1949年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三天后，即10月18日，长春10万敌人，一部起义，大部被迫投降。接着沈阳之敌也迅速土崩瓦解。11月2日，东北就完全解放了。整个辽沈战役，总计歼敌47万余人，取得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全国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解放全中国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辽沈战役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毛泽东决策的英明，也说明毛泽东关于抓主要矛盾的哲学思想的正确。

毛泽东认为，在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往往存在许多矛盾，它们的地位和作用各不相同，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居于领导地位，起着决定作用，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其他的矛盾是次要矛盾，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因此，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辽沈战役的成功，是毛泽东抓主要矛盾的思想的巧妙运用和具体体现。

5. 学会“弹钢琴”

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要求各级党委学会“弹钢琴”。他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1442页）就是说，要弹出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有主有次，有先有后，有轻有重，有高有低，有缓有急，互相配合，才能抑扬顿挫，琴韵悠扬，悦耳动听，扣人心弦，沁人心扉。不然的话，只能是噪音，震耳欲聋，真正成为乱弹琴了。

这里，毛泽东虽是就领导方法而说的，但是，这种“弹钢琴”艺术的说明，却体现出他的重要的哲学思想——抓主要矛盾，但不忽视次要矛盾；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但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

在毛泽东看来，之所以要抓住主要矛盾、注意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因为主要矛盾起着主要的、领导的、决定的作用，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即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它一旦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之所以不要忽视次要矛盾、不忽略矛盾的次要方面，是因为次要矛盾、矛盾的次要方面虽处于次要地位，但它们对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总是要起一定的影响作用，对于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解决，也有重要的制约作用，甚至在有的情况下，不解决它们，主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的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就像弹钢琴一样，不能不分主次，又不能只顾主、忘了次。而应当把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有机地统一起来，全面而又有重点地把握它们。一句话，一定要学会“弹钢琴”。

6.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

坏事能否变成好事？毛泽东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仅坏事能变成好事，毛泽东还认为，好事也可以变为坏事。他说，坏事有两重性，一重是好，一重是坏。“坏事里头包含着好的因素。把坏人坏事只看成坏，是片面地形而上学地观察问题，不是辩证地观察问题，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坏人坏事一方面坏，另一方面有好的作用。比如，像王明这样的坏人，就起着反面教员的好作用。同样，好事里头也包含着坏的因素。比如，解放以后七年来的大胜利，特别是去年这一年的大胜利，使有些同志脑筋膨胀，骄傲起来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55—356页）他还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同上，第397—398页）

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好事也可以变成坏事，这是为什么呢？只要我们看看毛泽东是怎样论述矛盾同一性问题，就彻底明白了。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明确地指出：矛盾的同一性，“说的是如下两种情形：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其相反的方面转化。”（327页）

对于第一种情形，毛泽东论证说，原来矛盾着的各方面，不能孤立地存

在。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试想一切矛盾着的事物或人们心中矛盾着的概念，任何一方面能够独立地存在吗？没有生，死就不见；没有死，生也不见。没有上，无所谓下；没有下，也无所谓上。没有祸，无所谓福；没有福，也无所谓祸。没有顺利，无所谓困难；没有困难，也无所谓顺利。如此等等。一切对立的成分都是这样，因一定的条件，一面互相对立，一面又互相联结、互相贯通、互相渗透、互相依赖。

对于第二种情形，毛泽东论证说，事情不是矛盾双方互相依存就完了，更重要的，还在于矛盾着的事物的互相转化。这就是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例如：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转化到对方原来所占的地位。在土地革命过程中，拥有土地的地主阶级转化为失掉土地的阶级，而曾经是失掉土地的农民却转化为取得土地的小私有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农民的私有制又转化为社会主义农业的公有制。其他，如生和死、战争与和平都是互相转化的。总之，“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8页）

说到这里，对于坏事和好事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问题，也许就见怪不怪了。新的问题在于，应好好地研究怎样创造条件，使坏事变为好事，而使好事不至于变成坏事。

7. “千刀当剐唐僧肉”与“僧是愚氓犹可训”

1961年下半年，浙江省绍剧团来北京演出《孙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后，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七律：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见到这首诗，于11月17日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诗曰：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域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在毛泽东的和诗中，指出唐僧是犯错误的好人，他人妖颠倒，是非不分，然而并非妖精一伙。郭沫若受到很大教育，当天即用原韵又和了一首，改变了原来的观点。毛泽东说：“和诗好，不要‘千刀当剐唐僧肉’了，对中间派采取统一战线政策，这就好了！”这段文坛佳话，生动地正确地展现了毛泽东关于不同质的矛盾用不同质的处理方法的哲学观点。

毛泽东认为，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但是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斗争的形式，则因矛盾的性质不同而不相同。就是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例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大众和封建制度的矛盾，用民主革命的方法去解决；殖

民地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用民族革命战争的方法去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共产党内的矛盾，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去解决；社会和自然的矛盾，用发展生产力的方法去解决。”（311页）

毛泽东还认为，世界上的矛盾尽管千差万别，各有不同，但就其性质来说，基本上可分为两类：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是指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一切到了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是指双方不具有根本对立的性质、一切不需要经过外部冲突形式去解决的矛盾。前者，在自然界中，炸弹爆炸、火山爆发、地震、海啸、雪崩等，都是对抗性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建立在阶级利益根本对立基础上的矛盾，如奴隶和奴隶主、地主和农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矛盾。后者，在自然界中，岩石的风化、水的蒸发、物种的进化等，都是非对抗性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如工农矛盾、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等，都是非对抗性矛盾。

不同质的矛盾，必须用不同质的斗争形式去解决。一般说来，对抗性的矛盾只能通过对抗的斗争形式去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则用非对抗的斗争形式去解决。只有严格地区别对待，才能正确地解决矛盾，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郭沫若“千刀当剐唐僧肉”的失误之处，就在于用对抗性的斗争方式去解决非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应当引以为戒的。

8. 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

毛泽东在论述矛盾法则时，提出了一个极为深刻而又非常重要的思想——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思想。他说：“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320页）

所谓“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是指矛盾的普遍性（或共性、绝对）和矛盾的特殊性（或个性、相对）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具体地说，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是任何矛盾自身固有的两重属性。“每一个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318页）就是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是一对形影不离的伴侣，它们共同存在于矛盾统一体中。只有个性而无共性或只有共性而无个性；只有相对性而无绝对性或只有绝对性而无相对性的矛盾体是不存在的。

二是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互相联结，表现为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无相对即无绝对。不能设想，在个别事物之外，还存在纯粹的一般事物。不能说，世界上除了一个个具体的人之外，还有什么抽象的一般的人。共性、一般、绝对是从个性、特殊、相对中抽象出来的。

三是共性和个性、绝对性和相对性，无不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由于事物范围的极其广大，发展的无限性，所以，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普遍性。”（318页）

为什么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呢？具体地说，一是因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是贯串于矛盾法则诸内容

之中的一条主线，只有理解和把握了它们的辩证关系，才能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矛盾法则。换句话说，正确理解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掌握矛盾法则的关键。

二是因为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关系是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重要方法。只有把握了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辩证关系，才能在实践中真正贯彻矛盾法则。

总之，如果说，矛盾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或核心，那么，可以说，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是矛盾法则的精髓；如果说，不懂得矛盾法则就不能懂得唯物辩证法，那么，就可以说，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也就不能懂得矛盾法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不懂得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因此，我们要真正把握唯物辩证法，就必须在掌握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上多下些功夫。

七、多环的链条——辩证法的范畴

辩证法的核心是对立统一规律，其他范畴如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联系、发展……等等，都可以在核心规律中予以说明。

——毛泽东

1. 要做到“胸中有数”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质和量两种规定性。那么，事物的质是由什么决定的、怎样才能认识它呢？质与量的关系又如何呢？怎样才能正确地把握事物的质和量？对于这些问题，毛泽东运用矛盾观点，都作了精辟的说明。

在《矛盾论》中，他说，“任何运动形式，其内部都包含着本身特殊的矛盾。这种特殊的矛盾，就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308 - 309 页）“每一物质的运动形式所具有的特殊的本质，为它自己的特殊的矛盾所规定”（309 页）“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322 页）。这些论述向我们表明：事物是由事物内部的特殊矛盾所规定的；认识事物的关键，就在于分析事物的矛盾的特殊性，特别是找出它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

毛泽东在实践中一再强调认清事物、注意事物的区别的重要性。例如：他曾多次强调要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认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和前途等一系列问题。又如，在进行一切具体工作时，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要注意划清不同事物的界限。他要求人们看问题一定不要忘记划清进步与反动、成绩与缺点的界限。“记着这两条界限，事情就好办，否则就会把问题的性质弄混淆了。”（1444 页）

在质与量这对矛盾中，一般说来，质是主要的、首先的，它决定量。但是，这决不是说可以忽视量。质和量是不可分割的，事物都是质和量的统一。因此，毛泽东在注意认识事物、区别事物的界限时，也强调适当注意事物的量。他曾明确地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1442 页）因此，要做到胸中有“数”，就是说，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有许多同志“不懂得注意事物的数量方面，不懂得注意基本的统计、主要的百分比，不懂得注意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1442 页）。

毛泽东运用矛盾观点，不仅分析了质和量两者的对立统一关系，而且对质与量各自的矛盾也进行了很好的说明。他认为，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有新旧两个对立面。就量来说，有新的量和旧的量的区别。从变化发展的观点看来，新的量一般是由少到多；旧的量一般是由多到少。新的量虽然开始少，却有生命力，可以以少胜多，最终代替旧的量；旧的量开始虽然多，但由于它是旧的东西，没有生命力，走的是下坡路，总要归于灭亡。因此，我们不但要有事物的量的观念，而且要有一个新量、旧量的观念。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的数量界限。

就质来说，也有新质和旧质的区别。从长远的观点看来，在新质与旧质的矛盾过程中，新质必然战胜旧质。事物的发展过程，就是新质代替旧质的过程。新质在发展过程中，虽然也会有曲折，但上升、前进是必然趋势，下

降、后退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旧质在变化过程中，虽然也会出现上升、前进的现象，但只能是次要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下降、退步则是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不但要注意不同事物的质的区别，而且要注意同一事物内部新质和旧质的差异。总而言之，无论对质还是对量都要做具体的分析，才能切实地把握它们。

2. 不应该肯定一切，也不应该否定一切

毛泽东认为，任何事物内部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两种因素。肯定因素是决定事物性质的因素，是保持事物存在的因素，是事物的正面；否定因素则是同事物性质相反的因素，是促使事物灭亡的因素，是事物的反面。事物就是在这两种因素的相互对立、相互作用中存在和发展的。因此，在认识事物时，“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97页）。

在分析肯定因素和否定因素的作用时，毛泽东指出了否定的革命性，阐发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认为，事物只有通过否定，才能实现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他用“破”与“立”的关系来说明了这个道理。抗日战争时期，针对某些人的“只要建设，不要破坏”的观点，他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中国，不推翻汪精卫的统治，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摧毁封建制度，就休想建设。“只有把这些东西破坏了，中国才有救，中国才能着手建设，否则不过是讲梦话而已。只有破坏旧的腐朽的东西，才能建设新的健全的东西。”（73页）在谈到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时，他指出，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的文化。因为“不把这种东西打倒，什么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们之间的斗争是生死斗争”（695页）。这就告诉我们，不破坏旧的东西，新的东西就建立不起来。可以说，否定是一切事物前进、发展的杠杆。

毛泽东充分肯定否定因素的重要意义，并没有否认肯定因素的必要性。他也看到，肯定因素是事物存在和发展的不可缺少的因素。他以遗传和变异的关系为例说明了这一点。他说，遗传和变异也是对立统一的两重性。如果只有变异的一面，没有遗传的一面，那么下一代的生物和上一代的生物就完全不同，稻子就不成其为稻子，狗也不成其为狗，人也不成其为人了。这说明，肯定的因素可以起到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使不断变化的事物在一定时期内固定起来或稳定下来。正因为肯定的因素也有其合理性，所以，毛泽东在说明否定的革命性、强调“破”的意义时，并没有把它与肯定、立的必要性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相反地，他认为，否定中有肯定，破中有立，否定的过程同时也就是肯定的过程，破的过程同时也就是立的过程。所以，否定不是全盘抛弃，而是扬弃，即既克服又保留。

总之，毛泽东所讲的否定，是辩证的否定，体现着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根据这种辩证的否定观，他强调对任何事物都应采取分析的态度，既反对肯定一切，又反对否定一切。

在对待中国古代文化遗产上，他科学地阐明了批判和继承的关系。一方面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应当给予总结，吸取其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精华，对民族文化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拒绝继承和借鉴中国古代的文化，是完全错误

的。另一方面又强调，继承并不等于毫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决不可以变成代替自己的创造，而是要予以革命性的改造，盲目地崇古、复古是错误的、有害的。

对于外国的文化，他也要求采取有分析的态度，既不能一概排斥，也不能盲目照搬。他说：“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083页）他严厉地批判了那种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照搬外国东西的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强调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707页）。

在对待实际工作的看法上，他强调，也应采取分析的态度，切勿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他说，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肯定一切，就是只看到好的，看不到坏的，只能赞扬，不能批评。这不合乎事实。不是一切都好，还有缺点。不应肯定一切，只应该肯定正确的东西。否定一切，就是不加分析地认为事情都做得不好，是一团糟。这也不合乎事实。不应该否定一切，只应该否定错误的东西。总之，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还是用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由于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革命力量大为削弱，革命形势一度陷于低潮。这时，中国共产党内的一些人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悲观的看法，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毛泽东针对这种悲观论，曾写了一封极为重要的信，这封信后来改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这封信里，毛泽东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预见了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他说：“中国是全国都布满了干柴，很快就会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话，正是时局发展的适当的描写。只要看一看许多地方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士兵哗变、学生罢课的发展，就知道这个‘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时期，毫无疑问地是不远了。”（102页）他还形象地指出，快要到来的革命高潮，“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106页）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毛泽东预见的正确性。

在同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有些人看不清革命的前途，而毛泽东却能作出科学的预见？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悲观论者被表面现象所迷惑，而毛泽东能正确把握本质与现象的关系，透过现象抓住本质。

本质与现象，是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毛泽东十分注意这对范畴。他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对它作了深刻的说明。

毛泽东认为，事物的本质是指事物的性质及此一事物和其他事物的内部联系，它是由其本身所包含的特殊矛盾决定的。现象与本质不同，它是事物的外部联系和表面特征，是事物的本质在各方面的外部表现。它反映本质但又不等于本质。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一切事物，它的现象同它的本质之间是有矛盾的。人们必须通过对现象的分析和研究，才能了解到事物的本质。”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0页）正是由于现象与本质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而且可能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99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强调透过现象抓住本质的时候，特别提醒人们区分事物的真象和假象，尽可能不要被假象所迷惑。假象，尽管也是现象，反映事物的本质，但是从反面歪曲地表现事物本质。因此，假象具有更加迷惑人的特点，给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造成特别的困难。如果人被假象所迷惑，就抓不住事物的本质，因而也就会认不清方向，在实践中碰壁、失败。

4.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是下棋时一步不小心，导致整局棋的失败。比喻在实行某项计划或办理某件事情时，由于在某个环节上不小心出了差错，导致整个计划或事情归于失败。毛泽东在其军事著作中，运用此语，意在说明战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

什么是全局？什么是局部？在毛泽东看来，全局就是事物的整体，即事物的各个方面和各个发展阶段的有机统一体；局部则是构成这个整体的一部分、一个侧面或事物发展的某一阶段。以战争为例，凡属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的，都是战争的全局，它包括有机统一的两个方面：在横向上，包括战争的各个方面、各个部分；在纵向上，包括战争的整个过程的各个阶段。而战争的局部是指构成战争全局的部分、方面和阶段。

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也是对立的统一。对于这种辩证关系，毛泽东着重从四方面作了概括和说明。

首先，全局和局部的区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在特定的范围内，全局就是全局，局部就是局部，这种区分是明确的、绝对的。但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范围的变更，这种区分也会发生变化，即在一定场合为全局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的东西，反过来，也是一样。比如：“世界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国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一个独立的游击区、一个大的独立的作战方面，也可以是战争的一全局。”（175页）在战争中，师的动作若是全局，团、营的动作便是局部；连的动作若是全局，班、排的动作便是局部。

其次，全局和局部互相联结，互相作用，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175页）。假如没有了一切局部，也就没有全局的存在。局部也离不开全局，并服从全局。“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175页）假如一个局部完全离开它赖以存在的全局，它也就不再成其为原来意义上的东西了。

第三，全局高于局部、统帅局部；局部应当服从全局。全局之所以高于局部，能够统帅局部，因为全局是贯串各局部的内在联系，是事物的全体和本质。“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175页）因此，局部应服从全局的需要，应当树立照顾全局的观点。所谓照顾全局，一是“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525页）二是“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525页）。

最后，局部反作用于全局，并给予全局以重大的影响。既然全局存在于局部之中，是由一个个局部构成的，那么，任何一个局部都必然会这样或那样地对全局发生影响作用。但各个局部由于在全局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因而对全局的作用不是平等、均衡的。有些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即出了问题，尽管对全局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不起决定性作用，有时甚至可以忽略不计。但是，如果组成全局的多数局部失败了或破坏了，即出了问题，那就可能引起全局的变化。这时，多数局部起了决定作用。有时，一两个局部破坏了或失败了，即出了问题，则可能直接影响着全局的成败。因为这个局部对全局来说，是决定性的环节，处于关键性的地位，因而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在强调全局对于局部的统帅作用时，也要适当地注意局部的反作用；在一般地注意各个局部的反作用时，要特别地注意那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即“走”好那关系到“全盘输赢”的“一着”。

5. 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篡夺胜利果实，在美国支持下积极准备内战。但由于中国共产党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国人民、世界民主舆论的反对以及蒋介石的内战还未准备就绪，蒋介石又不得不伪装和平。他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连续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为了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立即赴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经过43天的会谈，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双十协定》。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些都是上了《双十协定》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对蒋介石放松了警惕，认为和平已经实现，从此，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要由武装斗争转到非武装的、和平的斗争。毛泽东及时察觉了这种倾向，明确告诫全党：“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1156页）事实确实是如此，在《双十协定》公布不久，国民党就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进攻。由于毛泽东的英明预见，中国人民作了两手准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斗争，真正实现了祖国的和平。

以上事例，是毛泽东关于可能性和现实性辩证关系思想的成功运用。

毛泽东认为，可能性是包含在现存事物中的种种转化为他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趋势，是潜在的、尚未实现的东西，现实性则是当前存在着的事物，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性。因此，可能性与现实性是有差别的。不能把可能性的东西当做现实的东西。

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可能性与现实性的区别，而且对可能性本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从能否实现以及实现的程度上来说，可能性分为虚假的可能性和现实的可能性。所谓虚假的可能性，大致包括两种情况：一是没有任何客观根据的可能性。实际上是不可能性，因为它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的东西。二是有一定的客观根据，但又不充分，在目前条件下还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只有到了将来条件具备了，才有可能变为现实。所谓现实的可能性，是指在现实中有充分的根据，因而在目前条件下就可以实现的可能性。鉴于

这两种可能性的差异，毛泽东要求人们把它们加以区别，集中力量去办那些有现实可能性的事情，而不要像“左”倾冒险主义那样，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到现时来做。

从事物发展对人的关系来说，有好的和坏两种可能性。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凡是有利于无产阶级政党和人民群众的可能性，都是好的可能性；反之，则是坏的可能性。正因为有好、坏两种可能性，毛泽东反复强调，必须估计到好、坏两种可能性。他说：“要想到事情的几种可能性，估计情况的各个方面，好的和坏的，顺利的和困难的，可能办到的和不可能办到的。尽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20页）

在估计事物发展的好、坏两种可能性时，毛泽东指出，要努力避免坏的可能性，争取好的可能性。而要争取好的可能性，就必须充分地考虑到坏的可能性。他说：“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784页）

毛泽东还认为，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一定的条件。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条件是多种多样的。在人所能干预的事物发展中，既需要客观条件，也需要主观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是自觉的能动性）。而主观条件是更为重要的条件，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比如，“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487页）

6. 反对“开中药铺”

1942年，毛泽东曾作过一个有名的讲演，题为《反对党八股》。其中，他谈到反对“开中药铺”的问题。他说：“你们去看一看中药铺，那里的药柜子上有许多抽屉格子，每个格子上面贴着药名，当归、熟地、大黄、芒硝，应有尽有。这个方法，也被我们的同志学到了。写文章，做演说，著书，写报告，第一是大壹贰叁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还有大ABCD，小abcd，还有阿拉伯数字，多得很！幸亏古人和外国人替我们造好了这些符号，使我们开起中药铺来毫不费力。一篇文章充满了这些符号，不提出问题，不分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表示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说来说去还是一个中药铺，没有什么真切的内容。我不是说甲乙丙丁等字不能用，而是说那种对待问题的方法不对。现在许多同志津津有味于这个开中药铺的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形式主义的方法。”（838页）很明显，毛泽东不是真的反对开中药铺，而是反对那种开中药铺式的形式主义。

那么，什么是形式主义呢？怎样克服形式主义？看看毛泽东怎样分析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就明白了。

毛泽东指出，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在这对矛盾中，一般地说来，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必须服从内容。因此，在观察和处理问题时，就应当首先注意事物的内容，根据内容的需要决定形式的取舍、改造和创新。所谓形式主义，就是忽视内容、不顾内容、脱离内容，单纯地去追求形式的思想或做法。因此，要反对形式主义。

毛泽东还指出，形式在被内容决定的同时，还对内容有反作用。适合内容的形式，对内容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不适合内容的形式，则会阻碍内容的发展。因此，应当注意选择适合内容的形式以促进内容的发展，反对形式主义并不是不要必要的形式。比如文艺作品，既要有革命的政治内容，又要有完美的艺术形式。要求“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869 - 870 页）。

另外，同一内容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因此，我们应善于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形式，并使其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促进内容的发展。以中国革命为例，虽然武装斗争是主要的斗争形式，但并不完全排除其他斗争形式的存在。因此，要把武装斗争的形式与其他一切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地或间接地配合起来，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艺术的发展也是这样。艺术上有不同的形式和风格，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现象。因此，不能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形式，一种风格，禁止另一种形式，另一种风格，否则会有害于艺术的发展。

总之，要唯物而又辩证地处理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反对任何片面性。这样，才能真正防止和克服形式主义。这是毛泽东关于形式和内容辩证关系的思想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7. 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

统一性及独立性，是毛泽东常常提到的一对特有的范畴。所谓统一性，就是事物各方面的一致性、全局性、整体性，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就是下级要服从上级的集中统一领导；所谓独立性，就是事物各方面的差异性、局部性、不统一性。表现在上下级关系上，就是上级要允许下级有适合自己情况和特点的独立活动，有独立自主之权。

对于两者的关系，毛泽东曾用非常通俗的语言生动地作了阐述。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中，他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3页）这里，毛泽东告诉我们：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有区别的，但又是密切联系、相辅相成的。二者不可偏废，必须把它们有机地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毛泽东为我们正确处理统一性和独立性的关系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指出：“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524 - 525 页）因此，“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540 页）。

在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也注意统一性与独立性的有机结合。例如，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

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5页和273页）

总之，在实践中，毛泽东总是要求人们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要反对只要统一性，不要独立性，或者只要独立性，不要统一性的错误倾向。

8. 飞跃：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

自由，是一个美好的字眼，也是志士仁人追求的目标，还是许多思想大家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在领导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从哲学上也对自由问题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或思想。

什么是自由？毛泽东首先回答了这个问题。荷兰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毛泽东肯定并发挥了这一观点，进一步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只有在认识必然的基础上，人们才有自由的活动。这是自由和必然的辩证规律。所谓必然，就是客观存在的规律性，在没有认识它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着盲目性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33页）。

不难看出，毛泽东所讲的自由，是和必然相联系着的。他认为，必然和自由是辩证的统一。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不认识必然，就不会有自由。就战争而言，从事战争，就像在大海里游泳。战争指导规律（必然）就是游泳术。一个聪明的指挥员，要能够在大海中畅游，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就必须掌握战争的游泳术，即战争的指导规律。

认识必然是自由的前提或基础，但是，如果只停留在对必然的认识上，还不是真正的自由。若要取得真正的自由，就要以对必然的认识作指导，对客观世界进行改造。例如：人们认识了水文运行的规律，懂得了洪水可以兴利也可以为害的道理，并不等于人们在洪水面前就有了自由。要得到真正的自由，必须根据对水文运行规律的认识，兴修水利，如疏通河道，修水库，建电站等，把洪水管起来，使其听从人的支配。这样，才能避害趋利，从而在洪水面前有了自由。总之，自由不仅包括认识上的自由，更重要的，还包括行动或实践上的自由，就是说，自由是认识自由和实践自由的统一体。

毛泽东不仅给自由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而且给人们指明获得自由的方向和应抱的态度。他认为，自由是争取得来的。争取自由，必然正确发扬自觉的能动性。这是因为，客观规律固然为人们的自由提供了客观基础，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给人以自由，而只是给人提供了自由的可能性。人们要变这种可能的自由为现实的自由，就必须依靠自觉能动性的正确发挥。否则，自由就只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科学起着极为巨大的作用，是争取自由的武装。通过科学，人们不仅可以尽快达到前人经过长期奋斗方才达到的自由程度，而且能够改变我们的思维方式，抛弃各种不利的传统习惯和偏见，指导人们探索新的必然性，争取新的自由。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以自然科学方面的三次技术革命为例。三次技术革命，从其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及其对世界的改造来说，都是人类从自然界中取得自由的重大标志，而每次自由的获得，无不同科学的发展相联系。18世纪出现的以蒸汽机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是牛顿力学和热学结出的一个硕果；发生在19

世纪的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是在科学技术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电磁学带来的一个辉煌成果；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目前仍在发展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三次技术革命，是现代物理学和多门技术科学综合发展的结晶。

正因为科学是争取自由的武装，所以，毛泽东说：“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中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转引自《新中华报》，1940年3月15日）

毛泽东还认为，通过主观努力，人们从必然里获得了自由。这既是必然向自由转化的过程，也是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过程。

所谓必然王国，指的是人们掌握客观规律前而受规律支配所处的那种不自觉的、盲目的、被动的状态或境界。自由王国则与其相反，指的是人们掌握客观规律后，所处的那种自觉的、主动的状态和境界。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无限发展的过程。人类不可能穷尽对必然的认识，也不可能达到完全掌握了事物全部必然性的所谓绝对自由的境界。无论何时何地，总是存在着自由和必然的矛盾。人类历史不完结，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就永远没有完结。所以，在人类面前，永远会有必然王国，永远会有争取自由的斗争，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45页）。

八、真正的上帝 ——人民创造历史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毛泽东

1.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25年深秋，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词篇《沁园春·长沙》。当时，大革命的形势蓬勃发展，鼓舞人心，但蒋介石的篡权阴谋和陈独秀的妥协投降却令人愤慨。32岁的毛泽东，正值风华正茂、血气方刚之时。针对当时的形势，他在词篇中提出了气吞山河的发问：“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一发问，涉及到历史观中的一个重大的问题：“谁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民群众，还是英雄豪杰？”对于这个问题，不同的历史观作出不同的回答。

唯心史观宣扬唯意志论，认为英雄人物的思想、动机决定着历史的发展。宋朝有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把孔子说成是照亮中国历史前进的明灯，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现代资产阶级学者胡适甚至认为，圣人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英雄吐一口痰在地上，就可以毁灭一村一族；起一个念头，就可以引起几十年的血战。法国有个叫尼采的哲学家，宣称“超人”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只不过是“供实验的材料，一大堆多余的废品，一片瓦砾场”。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会发现，有的人往往把人民群众看成是“阿斗”、“群氓”，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帝王将相或者英雄豪杰决定的。

与唯心史观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他们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一根本原理出发，认为社会发展的历史，从根本上说，就是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生产方式新陈代谢的历史，因而也是从事物质资料生产的人民群众的历史。

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思想，总结了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用更加明确的语言，向苍茫大地庄严宣告：“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转引自1967年5月25日《人民日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031页）

2. 人民就是上帝

上帝，在宗教教义中，是宇宙的主宰，万事万物的创造者；在宗教徒的心目中，是无比伟大、极为神圣的字眼。“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全善、全智、全能、全爱”，是宗教教义和宗教徒们对上帝的赞美之词。实际上，上帝只存在于宗教教徒的观念中，只有他们，才对上帝无限信仰，顶礼膜拜。

科学是神学的死敌。唯物主义者头脑中没有上帝的位置。无产者认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马克思主义者早就以科学的真理彻底驳斥了关于上帝存在的种种谎言邪说。

毛泽东，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信奉科学的，不相信神学。然而，在他的心目中，却坚定地信仰着一

个并非神学中的“上帝”。

1945年6月11日，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举行大会闭幕式，毛泽东作了闭幕词。在这个庄严的场合，他讲了中国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愚公移山。

他说：“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1102页）

在讲完这个故事之后，接着，毛泽东又满怀信心地指出：“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1102页）

从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心目中的上帝，就是人民群众。把人民群众比作上帝，是毛泽东对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充分肯定。

3. 社会财富是谁创造的？

在毛泽东看来，作为上帝，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作用，突出地表现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明确地指出：“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27页）在谈到中华民族的发展时，他说：“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还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火药的应用，也在欧洲人之前。”（622—623页）这一切社会财富和文明成果，都是中国古代的劳动人民创造的。

社会财富，分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两种。社会的物质财富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因为，物质财富的创造离不开物质生产活动，而人民群众正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从事者和主体。正是他们的辛勤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物质资料，从而提供了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使人类社会能够赖以存在和发展。

人民群众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为什么这样说呢？毛泽东从三个方面作了说明。

第一，人民群众为精神财富的创造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比如：“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39页）由此可见，脑力劳动是依赖于体力劳动的，直接从事精神文化活动的人们所需要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由人民群众提供的，舍此任何人都不可能去

创造精神财富。因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活动。

第二，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为一切精神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以文学艺术为例。“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860页）

第三，人民群众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例如：“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622页）他们中的不少人出身于劳动人民或被压迫阶级。唐朝佛教《六祖经》记载惠能和尚，不识字，很有学问，虽然主张一切皆空，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明朝李时珍长期自己上山采药，写了《本草纲目》。更早些的，还有大发明家祖冲之，没有上过什么中学、大学。更近些的，萧楚女没上过学，通过自学，能写很漂亮的文章。郝建秀工人出身，在18岁的时候，创造了先进的纺织方法。打乒乓球的徐寅生，写了充满辩证唯物论的好文章。美国的富兰克林是印刷所学徒，也卖过报，他是电的大发明家，后来成了传记作家。英国的瓦特是工人，是蒸汽机的发明家，大发明家爱迪生，也是工人出身。发明安眠药的不是什么专家。而是一个小药房的司药。盘尼西林的发明者，是一个染匠，等等。

总之，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这是毛泽东将人民群众喻为上帝、视为历史创造者的基本原因。

4.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在毛泽东看来，人民群众所以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不仅因为他们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还因为他们是社会变革的巨大推动力和决定性因素。对此，他结合中国历史的发展和中國革命的实践作了充分的说明。

就中国的历史发展来说，每一次社会变革，都是通过人民群众的阶级斗争进行并实现的。奴隶社会的崩溃，主要是由奴隶的起义造成的；封建社会的改朝换代，大都依靠农民群众的力量。“中国人民是不能忍受黑暗势力的统治的，他们每次都用革命的手段达到推翻和改造这种统治的目的。在汉族的数千年的历史中，有过大小几百次的农民起义，反抗地主和贵族的黑暗统治。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623页）“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625页）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变革，更离不开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毛泽东说：“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632页）正是这些反抗斗争，推动着中国由半殖民地半

封建的社会走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以至社会主义社会。

人民群众为什么能够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呢？这是因为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革命的主体，占据着社会人口的大多数，从事着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就中国民主革命来说，“革命是什么人去干呢？革命的主体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老百姓”（562页）。其中，革命的骨干和最根本的力量，是占全国人口90%以上的工人、农民。“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674页）

正由于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所以，他们具有无比强大的力量。在不同的革命时期，毛泽东都明确认识到、充分肯定、高度赞扬了这一力量。

1933年6月，蒋介石实行堡垒政策，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到处都构筑了碉堡。据统计，至1934年1月底，江西共筑碉堡4000余座。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曾指出：“国民党现在实行他们的堡垒政策，大筑其乌龟壳，以为这是他们的铜墙铁壁。同志们，这果然是铜墙铁壁吗？一点也不是！你们看，几千年来，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宫殿还不坚固吗？群众一起来，一个个都倒了。俄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凶恶的一个统治者；当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起来的时候，那个皇帝还有没有呢？没有了。铜墙铁壁呢？倒掉了。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139页）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写了著名的《论持久战》。其中，明确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511页）“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408页）日本侵略者在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面前，就像一头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512页）。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在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以前，俄国国内究竟哪一方面拥有真正的力量呢？从表面上看，当时的沙皇是有力量的；但是二月革命的一阵风，就把沙皇吹走了。归根结蒂，俄国的力量是在工农兵苏维埃这方面。沙皇不过是一只纸老虎。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相反的，苏联以及各国爱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力量，却是比人们所预料的强大得多。”（1195页）

总之，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体，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力量，并因而成为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这是毛泽东把人民群众喻为上帝、视为历史创造者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5.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936年2月，毛泽东率领红军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开赴冀察抗日前线。行军途中，迎着漫天飞雪。有感于祖国的壮丽山河和无产阶级的历史重任，

他写下了不朽词篇：《沁园春·雪》：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意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这首词中，毛泽东继上阙借景抒情之后，下阙便由景及史，转而借史抒情。他纵观历史，评价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这样一些“英雄”或“风流人物”，歌颂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首词，体现了毛泽东关于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说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

毛泽东充分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并不否认英雄人物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在词里提到的“英雄”或“风流人物”，就是指那些能够反映时代要求，代表进步阶级利益，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的代表人物。“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623页）毛泽东认为，这些杰出人物，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产生出来的，而又在历史发展中起着一般群众所起不到的、非凡的作用。他们往往能及时而集中地反映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并能顺应历史潮流，推动历史的发展。例如，秦始皇，作为杰出的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家，兼并六国，统一中原，结束了西周以来诸侯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再如，孙中山，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在辛亥革命时期，他领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这些，都是孙先生的丰功伟绩。

当历史发展到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就出现了和以往任何历史时代的“英雄”或“风流人物”完全不同的新型杰出人物。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当然也包括毛泽东本人），就是这样的新型的杰出人物。他们对历史发展的作用，更加突出，更加伟大，是其他阶级的杰出人物无法比拟的。他们能创立和倡导革命理论，为人民群众提供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强大精神武器；能组织、领导人民群众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能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预见未来，在革命斗争的紧急关头，及时提出正确的战略、策略，绕过暗礁，排难而进。

然而，“事业是多数人做的，少数人的作用是有限的，应当承认少数人的作用，就是领导者、干部的作用，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作用，有了不起作用的还是群众”（《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51页）。英雄人物，包括无产阶级的英雄人物，作用再大，也离不开人民群众。因为，他们的才能、智慧，是在人民群众的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他们的作用如何，取决于他们能否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不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哪一个英雄人物也不行。因此，从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历史的创造者和决定力量，只能是人民群众。

6. 吃水不忘挖井人

在江西瑞金沙洲坝，至今还传颂着毛泽东打井的故事。

1933年4月，毛泽东随中央机关来到瑞金沙洲坝。一天，他从一位老乡那里了解到，沙洲坝历来缺水，中央机关来了后，村里多了上千人，吃水用水就更困难了。听了老乡的话，毛泽东夜不能寐，一直思索着怎样解决群众吃水难的问题。第二天早晨，他到村里村外转了几圈，回来后就让红军干部用竹子做水管，把北山脚下乌鸡岭下的泉水引进村来，再用一只大桶把水接住，这样先暂时解决了群众吃水难的问题。但终不是长久之计，毛泽东决定在村里打口井。他找来一些老乡，一直商量打井问题。接着又召开群众大会，决定在乌鸡岭下的泉水附近打井。过了几天，果然挖出水来了，全村人高兴极了，都争着去挑水吃。可是，过了两天就出了问题，村里人忽然都不愿意去井里挑水了。为什么呢？原来那口井附近有个坟场，群众犯了疑心，不愿吃这井里的水了。毛泽东了解情况后，又找到乡干部，决定另外打井。在村子附近重新找到了井位。为了打好井，毛泽东还带着乡干部下到井底，亲自铺上木炭和沙子。第二口井很快打好了。清清的井水漫上来，村里的老老少少都来看。有个老婆婆双手捧起又清又甜的井水喝了一口，高兴地说：“毛主席，您真替我们把什么心都操到了。”从此，沙洲坝的人再也不喝塘里的脏水了。他们为了纪念这件事，在井台上竖起一块碑，上面刻着两行醒目的大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这个故事，反映了毛泽东想人民之所想，时刻关心群众疾苦的优秀品质。其实，类似的事情，在毛泽东身上举不胜举，这些事迹，折射出毛泽东倡导的一贯思想：一切为了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是的，这的确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

早在1934年，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他就曾经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他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来。

后来，毛泽东又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一切为了人民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一切活动的根本宗旨、出发点和归宿，还是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因此，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处处想到群众，时时为群众打算，把群众的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应当说毛泽东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7. 要有甘当小学生的精神

毛泽东是最善于向群众学习的。他说：“必须明白：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790页）他还说，“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中国人民中间，实

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在这千千万万个“诸葛亮”面前，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所以，他要求各级领导者，“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933页），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出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要先当群众的学生，再当群众的先生。对自己，他也是这样要求的。1941年，在谈到农村调查问题时，他说：“我现在还痛感有周密研究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的必要，这是和我自己对于中国事情和国际事情依然还只是一知半解这种事实相关联的，并非说我是什么都懂得了，只是人家不懂得。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791—792页）

毛泽东认为，向群众学习，必须“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148页）。他说：“没有满腔的热忱，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790页）

毛泽东还特别地指出，向群众学习，必须善于从本质上发现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不能拘泥于表面的或现象的东西，特别不能把群众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当做优点和正确的东西去宣扬，去效法。必须注意把群众的意见和经验集中起来，进行分析和综合，使之成为指导实践的更好的道理和办法，不能停留在零碎材料的掌握和不同意见的搜集上。

可见，毛泽东不仅强调了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而且为怎样向群众学习指明了方向。这是他的群众观点的重要内容。这些内容，对于我们在实践中从群众身上吸取智慧和力量是有重要意义的。

8.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1943年6月，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899页）又说，“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900页）

“从群众中来”，就是将群众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科学的领导意见。也就是通过调查研究，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形成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

为什么要从群众中来呢？毛泽东告诉我们，这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而社会实践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实践。离开“从群众中来”，领导者的认识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打个比方说：“我们的领导机关，就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这一方面说来，只是一个加工工厂。大家知道，工厂没有原料就不可能进行加工。没有数量上充分的和质量上适当的原料，就不可能制造出好的成品来。”（《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819页）领导者的头脑，只起一个加工工厂的作用，其原料和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

“到群众中去”，就是把集中起来的领导意见化为群众自觉的实践活动。也就是把吸取群众意见而形成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拿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思想 and 自觉行动，并在群众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发展。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一个循环往复、不断发展的过程。就是说，任何一项正确的方针、政策、计划和办法的形成和实施，都不可能只

通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个具体过程就能完成的，而往往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完成。因此，要不断地走群众路线，不断地总结经验，集中群众的智慧，形成正确的意见，以指导行动。“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899页）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毛泽东阐发的群众路线的核心内容，也是重要的领导方法。事实证明：遵循它，我们就得到成功；违背它，我们就遭受挫折。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九、壮丽的日出

——哲学和哲学的解放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毛泽东

1. 知识、科学、哲学

正如有多少位观众就有多少个哈姆雷特一样，不同的哲学家对哲学有不同的理解。黑格尔把哲学比作“黄昏时刻起飞的猫头鹰”，马克思却把哲学喻为“报晓的雄鸡”。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对哲学是如何看的呢？——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1942年2月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一篇重要演说——《整顿党的作风》。其中，在谈到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时，他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815—816页）

这是毛泽东从知识与哲学的关系的角度，给哲学下的一个明确定义。这个定义，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它说明了哲学的来源。告诉人们：哲学是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归根到底，它以实践为来源。

第二，它说明了哲学研究的对象。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一样，是以揭示事物发展的规律为己任的；它又与各门具体科学不一样，它揭示的贯串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等一切现象中的普遍规律，而不是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规律。作为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层次上是最高的；在范围上，是最普遍的。

第三，它说明了哲学在科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告诉人们：哲学以具体科学为基础，并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

第四，它说明了哲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告诉人们：哲学也是一种知识，但又不是普通的知识。它与智慧相联系，是用来统摄和驾驭普通知识的。因此，它更能够培养人的能力，更容易使人聪明。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还说过哲学是使人聪明的学问。

毛泽东关于哲学的定义，为我们理解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

2. 两个对子

毛泽东用矛盾观点研究哲学自身及其发展，提出了有名的哲学上“两个对子”的思想。

早在1937年，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就以“两种宇宙观”为标题，集中地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他说：“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关于宇宙发展法则的两种见解，一种是形而上学的见解，一种是辩证法的

见解，形成了互相对立的两种宇宙观。”（300页）毛泽东还具体分析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主要之点。这就是：形而上学宇宙观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辩证法宇宙观则主张用联系的、发展的和全面的观点去认识事物。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地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归结为哲学上的对子，但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

1957年初，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了“两个对子”的思想。他说：“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互相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

毛泽东关于“两个对子”的思想，正确地反映了哲学发展史上的客观事实。就“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这个对子来说。在哲学史上，古往今来，尽管存在纷纭复杂的观点和论述，出现千流百派，说到底，在回答世界“是什么”，“不是什么”的问题上，都分属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营垒。无论何时何地的哲学家，要超越这两大营垒，企图走第三条道路，归根到底，是不可能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既对立又统一，共同推动着人类哲学思想的不断发展。就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个对子来说，情况也是这样。如果说，前一个对子解决的问题是关于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的问题，那么，这个对子解决的问题是世界的状况怎么样。在哲学史上，古往今来，尽管存在着众说纷纭、学派林立的情况，说到底，在回答世界“怎么样”、“不怎么样”的问题上，都分属于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派别。企图超越这两大派别，走第三条道路，也是不可能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统一，同样推动着人类哲学思想的发展。

毛泽东的“两个对子”的思想，对于我们步入哲学的殿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说到这里，使我们想起一个古老而又有趣的故事。

传说在那湛蓝湛蓝的海边，有一座突兀陡峭的大山，山腰里有一个琳琅满目的大宝库。其中，什么样的好东西都有。然而，普通的人即使站在宝库的大门口，也看不见它。谁想进入宝库，就必须寻遍天涯海角，找到那位崇高多识的老人，请他用金钥匙打开你心灵的大门，然后你才能找到宝库的大门，进到宝库里边，自由地挑选你所需要的东西。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谁想要进入人类智慧的宝库，就必须掌握一把金钥匙。

哲学也是一座智慧的宝库，进入其中，也必须掌握一把金钥匙。毛泽东关于哲学上“两个对子”的思想，就是一把金钥匙。毛泽东说过：“你们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的书，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不懂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没有同这些反面的东西作过斗争，你那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不巩固的。”《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6页）可见，只要我们紧紧抓住“两个对子”这把金钥匙，就能打开哲学宝库的大门，登堂入室，沿着正确的方向，一步一步地学好哲学。

3. 空前的大革命何以发生

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及其意义作了精辟的阐述。

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产生，“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303—304页）。这个大革命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是由多种原因决定的。

首先，这个大革命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坚实的阶级基础和必要的自然科学前提。他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300页）

事实确实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在西欧一些国家占据了统治地位。英国、法国、美国以及德国等资本主义国家，都程度不同地实现和正在实现工业革命。工业革命的迅速发展，使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向前发展。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大发展，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高。这就使得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日益激化。这一矛盾，表现在阶级关系上，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无产阶级已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世界历史舞台。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其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世纪40年代以后，相继出现的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等三大发现。这些发现，使人们对自然过程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提供了重要的自然科学前提。

其次，这个大革命的产生，有其重要的理论来源。毛泽东说：“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303—304页）

事实确实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及其发展，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而产生的偏狭的学说，而是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他们的哲学学说时，直接得益于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们一方面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另一方面，抛弃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成分，批判地吸取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从而创立了崭新的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最后，这个大革命的产生，离不开马克思恩格斯的主观努力。毛泽东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287页）

事实确实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自己哲学学说时，一方面孜孜不倦地研究以往人类认识的积极成果，如饥似渴地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另一方面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是理论家、思想家，但首先是革命家。他们始终关注着革命斗争的进程，及时指出革命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与革命斗争同生死共患难。在革命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没有他们的积极努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

毛泽东正确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意义、必然性，有利于我们自觉地、完整地去学习和运用这一哲学。

4. 船夫和哲学家

哲学是五花八门、多种多样的。但是，真正科学的哲学，最能使人聪明的哲学，在毛泽东看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较之以前的哲学，具有全新的特征。

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特点是什么呢？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辩证唯物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284页）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作为一定阶级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必然受着一定阶级、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的巨大影响。任何哲学家都是一定阶级一定社会集团的代表，并为一定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地位所制约。不同的哲学，自然也是对不同阶级或社会集团利益的反映，哲学的派别斗争，同样也是适应一定阶级的政治斗争需要的。一般说来，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大致反映了革命阶级和反动阶级，进步势力和落后势力之间的政治斗争。总之，哲学从来就是有阶级性的。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都不承认或不敢公开承认自己的阶级性，它们总是乔装打扮，把自己说成是代表全人类的、超阶级的、超党派的哲学。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与一切旧哲学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哲学与阶级、哲学斗争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并且公然声明自己的阶级性，指出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服务的。总之，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一点，是完全正确的。

同样完全正确的是，毛泽东把实践性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另一个显著特点。

1882年，马克思在写给他的女儿劳拉·拉法格的一封信中，引用了这样一则短小明晰的阿拉伯寓言：有一个船夫准备好在激流的河水中驾驶小船，上面坐着一个想渡到河对岸去的哲学家。于是发生了下面的对话：

哲学家：船夫，你懂得历史吗？

船夫：不懂！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生命！

哲学家又问：你研究过数学吗？

船夫：没有！

哲学家：那你就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生命。

哲学家刚刚说完了这句话，风就把小船吹翻了，哲学家和船夫两人都落入水中，于是

船夫喊道：你会游泳吗？

哲学家：不会！

船夫：那你就失去了你的整个生命！

马克思通过这则寓言，表达了他对投身于现实生活斗争的火一般的激

情；而且说明了实践、生活对于哲学、对于哲学家有着生死攸关的重要意义。

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患有轻视实践通病的旧哲学不同，它是实践的唯物主义。它不只是希望达到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它的根本任务在于能动地改变世界。它不仅科学地规定了实践的概念，而且科学地阐述了哲学指导实践、付诸实践、为实践服务的主要功能及其目的。总之，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以往哲学的最显著特点。

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显著特点的精辟阐述，既有助于我们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也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产生、发展的规律和过程。

5. 一身而二任焉

“一身而二任焉”，意思是说，一个人担任两项职务或担负两重责任。唐代韩愈在《圻者王承福传》记载：泥瓦工王承福说，他本为劳力之人，如果成了家，操心生活，还要劳心，是“一身而二任焉”。其实，不仅人，其他许多事物，也往往是一身而二任焉。毛泽东认为，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就是说，它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身而二任焉。

哲学与人的世界观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具有思维能力。人的任何行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意识支配下进行的。人的大脑就像一部自动控制的装置，它的核心部分，就叫做世界观。所谓世界观，就是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世界观人皆有之，它是人们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准绳。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说，就是说，哲学不是一般的世界观，而是理论化、系统化了的的世界观，它与那种自发形成的世界观有根本的区别。

哲学既是世界观的学说，也是方法论的学说。什么是方法论呢？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讲过：“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39页）在这里，怎样过河，使用什么工具过河，就是方法问题。大家知道，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和从事的活动，概括起来，无非两大类，即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认识世界要有认识方法或思想方法，改造世界要有行动方法或工作方法。各种各样的具体任务，要用各种各样的具体方法来完成。现成的、万能的具体的方法是没有的。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并不能给我们提供现成的具体方法，而是教给我们如何根据各种具体情况去寻找各种具体方法。这种从一般原则上研究方法问题的学问，就叫做方法论。

毛泽东认为，哲学作为世界观的学问和作为方法论的学问是一致的。他说，世界本来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用这样的世界观去看世界，去研究世界上的问题，去指导革命，去做工作，去从事生产，去指挥作战，去议论人家长短，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方法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一个东西。

毛泽东关于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体的思想给我们以重要启示：要使朴素、自发的世界观上升到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进而掌握科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生活、学习和工作。

6. 望远镜、显微镜及其他

任何哲学，说到底，都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但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是真正使人聪明的学问。毛泽东曾经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眼力不够，应该借助于望远镜和显微镜。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是政治上军事上的望远镜和显微镜。”（212页）他还说：“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1469页）毛泽东这里所说的方法和武器，主要是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事实证明：只要我们真正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望远镜、显微镜和武器，就会大大地开阔眼界，提高理论思维能力，在认识事物时，看得准、看得全、看得深、看得远；在实践中，信念坚定、方向明确，方法对头，少走弯路、少办蠢事，不断地取得胜利，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多次要求人们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那么，怎样才能学好或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呢？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不是像有的人那样，“他们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是直接违反马克思主义的”（798页）。具体地说，应当注意如下几点：

一是用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533页）应当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完整准确地把握它的科学体系，为着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去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

二是要认真读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集中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者和继承者的著作中。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步，就是要读好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特别是他们的哲学专著。事实证明：只有亲自到哲学原著那肃穆的圣地去才能找到那永垂不朽的哲学大师。

三是要有的放矢，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去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毛泽东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比作箭和靶的关系。他批评了两种人，一种人是“无的放矢”，乱放一通，给革命带来损失，一种人好像是古董鉴赏家，把箭操在手里，连声赞好，就是不放，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他主张：“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820页）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应用于实际，这个实际的范围大致上包括两大类：客观实际——与改造客观世界活动有关的问题；主观实际——主观思想认识中的与改造主观世界相联系的问题。理论联系实际，就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理论，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

7. 从“毛粒子”的命名说起

1977年，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第7届粒子物理专题国际会议上，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S·L·格拉肖建议，将现在称为“层子”或“夸克”的这一物质层次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其理由是“因为它与中国毛泽东主席有联系。按照他的哲学思想，自然界有无限的层次，在这些层次内一个比一个更小的东西无穷地存在着”。持同样看法的，并不止格拉肖一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毛泽东长期以来，阐述和坚持了自然界无限性和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他在同国外著名科学家交谈中，提出了宇宙存在两方面的无限性的思想。他说：世界是无限的。世界在时间上、空间上都是无穷无尽的。在太阳系外有千千万万个恒星，它们组成银河系。银河系外又有千千万万个银河系。宇宙从大的方面看来是无限的。宇宙从小的方面看来也是无限的。

毛泽东认为，不仅自然界是无限的，而且物质本身也是无限可分的。他曾经说过：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以分，电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庄子讲“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对的。因此，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毛泽东在同自然科学家的多次谈话中，都强调和论证了物质无限可分的思想。例子如下：

1955年1月，在专门研究我国原子能科学事业发展问题的会议上，当有的科学家谈到根据现有的科学研究，还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时，毛泽东说，我看不见得，质子、中子、电子还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明，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是可分的。

1964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日本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时，对坂田的《关于基本粒子新观点的对话》一文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坂田关于基本粒子不是不可分的思想，是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立场上。就坂田昌一的文章提出的基本粒子可分的观点，毛泽东还单独召见我国有关科学家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座谈。

1973年7月，毛泽东在接见美籍中国物理学家杨振宁时，他问杨振宁，现在光量子能不能分？杨振宁说，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解决。毛泽东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如果物质分到一定阶段，变成不可分了，一万年以后，科学家干什么呢？

毛泽东关于物质内部矛盾性和无限可分性的思想，给粒子物理学的科学实验提供了哲学方法论。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物理学家60年代中期，提出了关于物质结构的“层子模型”理论。西方物理学家则提出了关于基本粒子结构的“夸克”学说。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各国科学家已经陆续发现数百种基本粒子，证实了毛泽东关于物质无限可分性思想的正确性。由此看来，“毛粒子”的命名是当之无愧的。从这里可以使我们领悟到毛泽东关于哲学如何指导各门具体科学的思想。

毛泽东认为，哲学是具体科学的概括和总结，它的产生，它的发展都离不开具体科学。就是说，哲学是以具体科学为基础的。反过来，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和发展也需要哲学的指导。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为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发展指出了方向。既然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指导和基础的对立统一，那么，我们在把握两者关系时，既要反对“代

替论”——片面强调哲学的指导作用，忽视以致否认具体科学的基础性作用。又要反对“取消论”——片面强调具体科学的重要性，贬损以致取消哲学的作用。

毛泽东反对“取消论”，强调必须学好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这个东西没有学通，我们就没有共同的语言，没有共同的方法，扯了许多皮，还扯不清楚。有了辩证唯物论的思想，就省得许多事，也少犯许多错误。他多次劝同志们学哲学，特别是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

毛泽东也反对“代替论”。他说：“学习马克思主义，是要我们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世界，观察社会，观察文学艺术，并不是要我们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写哲学讲义。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874页）这句话虽然直接讲的哲学同文学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但其反对“代替论”的基本观点却有普遍的意义。

从“毛粒子”的命名可以看出，毛泽东为我们用哲学指导具体科学的研究，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8. 让哲学解放出来

哲学的解放，具有丰富的内容。就其主要之点说来，至少有三方面含义：一是指哲学从旧哲学思想体系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从而创立新的哲学思想体系；二是指新哲学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三是指哲学从书斋里解放出来，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毛泽东所讲的哲学的解放，主要是指第三方面。

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毛泽东反复强调，哲学要解放，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

1938年10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毛泽东强调：“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533页）他号召“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533页）

1942年，在《整顿党的作风》一文中，他提出：“我们要反对主观主义，就要宣传唯物主义，就要宣传辩证法。”（827页）

在另外的时间和场合，毛泽东又明确地说过：“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圈子走到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98页）“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同上，第413页）“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引自《人民日报》1966年9月21日）

为什么要进行哲学解放呢？在毛泽东看来，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的要求，也是各项事业顺利发展的需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又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只有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所接受、所运用，才能体现出它的阶级本质，也才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515页）。

当然，也得不到检验和发展。

从各项事业的发展来看，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哲学的解放，是我们各项事业顺利发展，取得胜利的重要条件。只有使广大群众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自觉地、正确地以其作为行动的指导，我们才能少犯错误，多做工作，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哲学的解放呢？毛泽东着重指出如下几点：

一是要立足于实践，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毛泽东多次提出，搞哲学不要搞旧式思辨哲学，书本哲学，而要搞实际的哲学，群众的哲学。哲学工作者要深入到实际中去，深入到群众中去，与群众打成一片。哲学只有在同实践紧密联系的时候，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欢迎，也才能真正地发挥出哲学的功能。

二是力求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通俗化。要使深奥的哲学道理通过民族的、群众的语言和形式，结合中国传统哲学的优秀成果，通俗地、生动地阐述出来。“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534页）

三是把哲学的普及和提高有机地统一起来。哲学普及和提高是相辅相成的。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只有把两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才能使哲学的解放广泛、持久而又深入地进行下去。

应当指出，在一个时期内，哲学的解放在实践中被简单化、庸俗化，既干扰了我们事业的发展，也败坏了哲学的声誉。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否认毛泽东关于哲学解放思想的科学价值。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问题，不是要不要哲学的解放，而是怎样才能正确而有效地实现哲学的解放。我们时刻不应忘记，哲学的解放是人类解放的先导。

